



苏俄：

官僚集团如何夺权

作者：乔治柯林斯 (George Collins)



导言：纪念俄国革命九十周年

彼特·塔菲 (Peter Taaffe) 作于 2007 年
英国社会主义党 (Socialist Party) 总书记

与十年前不同，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已经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以及现在在缅甸爆发的番红色革命。这些革命之所以能为统治阶级接受，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挑战资本主义统治，而是力求巩固和“完善”它。

相比而言，发生在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则是第一次为工人阶级寻求出路。正如保皇派将军扎列斯基 (Zalesky) 其悲痛地看着俄国革命时对被“剥夺”了的资本家和地主所说的：“谁会相信法院的看门人会突然成为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或是成为医院的管理者，亦或是成为了公务员，昨日的下级士兵成为了指挥官，昨日的奴隶成为了普通劳动者或市长，昨日的列车加油工成为了主管，昨日的铁匠成为了工厂的主人？”。

但是在俄国革命中这是千真万确发生的事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群众推翻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摧毁了酷刑室般的沙皇独裁。此外在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夺取了政权并之后建立了真正的工人民主。在过去的 90 年中，对工人阶级而言，有许多次机会踏上俄国工人 1917 年所走的道路。而不是罗伯特·丹尼尔斯 (译注:Robert V. Daniels, 《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崛起和失败》(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Russia) 的作者) 错误地认为那场革命不过是在工业化第一阶段“不发达”社会中的产物。然而在二战后，革命浪潮甚至比俄国革命更猛烈地席卷西欧——在意大利、法国、以及在英国。在 1968 年法国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总罢工，约有 1000 万工人参与。他们占领工厂夺取权力，但是却被自己的组织——共产党、工会和社会党领导人阻止。在 1974 年葡萄牙革命中，资本主义政府解体。绝大多数葡萄牙军官都非常激进地向社会主义方向迈进。(而在俄国，军官们依然对革命非常敌对和极不饶恕。)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革命可都是发生在“发达”的先进工业化欧洲。作为一种颠覆社会的革命在已经没有出路时就会爆发。在此之前，群众们会多次前进和后退直到他们相信有必要承担起“最后的战役”。九个多月的俄国革命 (译者注：从 1917 年的 2 月革命开始) 就是这样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前进的。

7 月所发生的事情为反革命的反扑准备了土壤，残暴地联手镇压布尔什维克并对其抛出大量诽谤。这最终导致，保皇派分子科尔尼洛夫将军在与克伦斯基联盟的掩护下试图扼杀用鲜血换来彼得格勒 3 月份的革命果实。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群众呼声压力下被迫释放了布尔什维克的一些领导人，如托洛茨基，让他们去保卫彼得格勒以便于粉碎科尔尼洛夫的军事政变。

同样地当斯宾诺拉 (Spinola) 将军试图破坏 1975 年葡萄牙革命时，葡萄牙工人阶级不自觉地摹仿了其兄弟姐妹 58 年前的行动，完全压制了斯宾诺拉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团结甚至帮助其战胜了斯宾诺拉的特种伞兵。而这些反过来推进了革命进程，70% 的工业从而被接管。

可是 1917 年科尔尼洛夫的失败并未导致类似的结果在俄国出现出现。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反对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政府的主张。

革命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历史学家所宣称的少数人密人谋政变的产物。丹尼尔斯的书中却认为十月革命可以预防：“如果温和的苏维埃领导人可以抢在布尔什维克进行号召——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之前通过对权力的全面掌握来阻止发生”。他接着引用另一位历史学家说的：“如果克伦斯基立即宣布和平并将所有土地交给农民，列宁有可能永远不会走进克里姆林宫。当然这些的纲领是由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提出的而不是凭空假设的。布尔什维克拒绝了为其反对者获胜利上保险的温和因素”。这些“温和派”被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所束缚而不会得出如此的纲领。深入土地改革遭遇到地主和资本家们的强大阻力。通过银行资本的联合他们 (“温和派”与地主和资本家们) 往往是一体的。

作为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任务之一的俄国的农村革命只有在工农政府取得政权后才能真正完成实施。

1917年当时布尔什维克，也只有布尔什维克一直在为此奋斗。

最初群众对布尔什维克的思想还很疑惑和敌视。在7月当布尔什维克遭到迫害转入地下时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影响下邓尼茨矿工们在约5000人参加集会中宣誓道：“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和上帝发誓……我们将永远不会放弃1917年2月28日鲜血换来的自由……我们决不会听从将会带领俄国走上毁灭的列宁主义，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告诉我们，地将无偿地给人民；资本主义体系必在战后结束，并被社会主义体制所取代”。

正如托洛茨基提到，这誓言是直接反对布尔什维克在现实中领导革命。他们需要的是土地、和平、面包和自由。而他们的对手正尝试的这个体制无法提供这些给他们。

渐渐地，群众们看到并理解了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对其的敌视早已抛出脑后转而坚定地支持。一名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士兵说道：“在科尔尼洛夫失败后所有的军队都染上了布尔什维克的颜色，所有人被影响，因为布尔什维克曾说过的话成为了现实”。

布尔什维克的增长

布尔什维克在8月和9月大量增长。群众们喊着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如同他们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反过来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垮台了：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杜马选举得票从6月的37万5千到9月增长为54万张。

莫斯科卫戍部队90%支持布尔什维克，在一些分队里支持率甚至达到95%，在车间和工厂委员会里，同样的发展也是显而易见的。在2月革命开始时，布尔什维克仅是少数派在苏维埃占1%—2%，列宁4月回国后也只达到4%。

在那时，列宁曾宣布道：“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处于少数地位，比起受资产阶级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无产阶级的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盟……暂时还处于较弱的少数地位。……当这个政府（译者注：苏维埃）还受资产阶级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宣传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只要我们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使群众不再受骗。我们不希望群众相信我们的诺言，我们不是江湖骗子。我们希望群众从实际经验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114—115页。）科尔尼洛夫失败后，这得到了证实。

革命是一个进程，丹尼尔斯说道：“革命是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的长期发展”。可这个在时间范围上看总体上没错的解释并不适用于俄国，因为当时亟需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带给革命的专制特征和高度紧张。但革命最终达到即政权问题的提出这一决定时刻时，如果被压迫的群众没有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前剥削者会设法通过反革命篡夺革命果实。因为这曾真实地发生在1925—1927年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当时的中国身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血腥恐怖之中，以及陷入帝国主义如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行为中。

毋庸置疑，如果工人阶级不夺取政权，那么新的科尔尼洛夫和恐怖统治将随之出现，而不是出现资本主义教授们所说的“温和”的人道资本主义民主。但革命是由整个前期和存在着的先决条件决定的。俄国统治阶级（贵族、保皇派、官僚和政治上较弱的资本家）腐烂消失掉了，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扎根于人民群众。

被压迫民族要求的自由被妥协者所出卖。当时农民起义以及对土地要求的提出相当普遍。77%的农业部门在那年的秋季起义。而主要集中在大工厂和活跃地区的工人阶级也感到他们“不能再像这样下去了”。这是1917年人民情绪的无疑反映。

存在革命的可能，然而革命机会依然会由于错误的领导而逝去。在1917年之前和以后的历史中证明了这点。与马克思一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缔造人的恩格斯曾指出在整个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中可能会20年如一日的没什么改变，也可能在一天之内凝聚了20年来所发生的事件。

广而言之，这是革命时期的特征。由于谋杀的威胁自从7月以后就在芬兰处于地下的列宁曾催促布尔什维克领导革命，他认为俄国的命运将在两三天内被决定。

事实上工人阶级和穷困农民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持续了仅仅两到三月，其可能是9月或10月。在10月革命之前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群众突然变的急躁，嘟囔着说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政党一样不愿夺权。同时在布尔什维克的左翼中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增多。

在彼得格勒的托洛茨基认识到在苏维埃方面发生了许多的巨大变化。其本人也随即果断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同时克伦斯基的联合政府试图将最革命的士兵部队调离彼得格勒，这明显是为了准备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

当时作为苏维埃主席的托洛茨基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组成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以保卫革命果实。这个机构直接指挥了十月暴动。要做到这一点，其需要“客观因素”的存在——布尔什维克。这个政党的存在导致了十月革命获得了胜利。

国际影响

丹尼尔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国际主义的观点彻底迷失了：“尽管对1919年寄予厚望，世界革命并没有出现。”与此相反，十月革命本来只是“震撼世界的十天”。列宁和托洛茨基认为俄国革命不过是欧洲和世界革命的导火索。

1918年的德国革命、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一连串的政治动荡，但如果欧洲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具备严格像布尔什维克般的领导，那将完全改变欧洲和世界的情况，并将改变历史。群众性政党的作用不能与革命进程分开，它就像难产时妇产医生用的镊子一样重要。没有它革命就可能流产。

尽管在20世纪有许多的革命机会和革命地区（例如在尼泊尔），可却只有俄国工人阶级直接夺取了政权，并在短时期内（1917-1923）建立了真正的工人民主，它这意味着所有官员来自选举，可随时罢免及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

由于极权主义史达林主义的疫病，旧工人阶级组织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的萎缩和瓦解，和他们控制的丑恶官僚机构。新一代青年和工人往往拒绝“党”的主张甚至排斥任何组织。

然而没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革命领导层的群众性政党，历史证明革命机会可能被浪费甚至给群众带来可怕的后果。俄国革命的教训是需要一个基于政治觉悟工人的自觉控制及其将民主和影响力反映在各个方面的政党。

这同样适用于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可丹尼尔写到：“每个伟大的革命都以某种形式的独裁统治而告终。”所以他认为这将会继续发生在未来。丹尼尔到现在为止完全无视革命所面对的客观现实。

举例来说，18世纪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在严格具有较高经济文化水准的国家里。而周边国家却极度的恐惧，他们害怕将会遭遇与法国贵族和皇室成员一样的命运。于是封建欧洲联合英国资本家们一起反对革命法国。这个因素导致革命被迫从民主转变成波拿巴的独裁统治。

俄国革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的发生是基于工人阶级最民主的组织——苏维埃（工人委员会）——，由此出现历史上未曾见过的最民主的工人国家。

其堕落并不是像丹尼尔和其他人所简单认为是由于史达林主义是马列主义所固有的内生物。而是因为俄国革命的孤立。列宁和托洛茨基从来没有认为在经济文化如此落后的社会里能孤立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只有欧洲革命的胜利并通过建立一个欧洲社会主义联邦才会保证从一开始民主就会巩固并扩大。

然而事态发展是相反的，这个年轻的工人国家面临着内战。一无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与21个帝国主义军队勾结起来试图破坏这个国家。在这一时期，革命仅限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其余的俄国地区还在地主和资本家反动分子手中。可是通过革命阶级的努力和国际主义影响最终是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内战的胜利，而这如果得到欧洲和世界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支持是非常有效的。丹尼尔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的专制是其固有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斥责布尔什维克禁止其他党派反对他们。但他忽视了一个细节。除了法西斯主义者右翼反动分子黑色百人团以外，所有的政党都被允许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存在。只是当他们组织军队诉诸内战方式时布尔什维克才被迫采取行动。

试想一下：美国总统林肯会允许奴隶主在内战中发展？他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地盘？在英国内战中克伦威尔及议会军会让查理一世继续保留自己的军队？

只是假设提出的问题就证明在阶级内战中剥削者所谓的“民主”是如何荒谬和抽象。然而，这些方式可能没有必要。当革命在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里发展，其将不可避免的在国际上传播。现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巨大震动——正预示着未来的经济衰退。

许多人讥笑在现代社会中的革命前景，但动荡伴随着大量的“对社会不幸”的发泄（他们可以自由地将这些解释为革命，虽然它们（革命）仍然处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周边地区”）也将在 21 世纪的“发达”社会中成为现实。

目录

编者前言	2
序	3
俄罗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4
工人国家的孤立与堕落	9
一国社会主义	20
官僚集团的反革命	25

编者关于本手册的说明

这本小册子由乔治·柯林斯（George Collins）写于 1987 年，当时他是工人国际委员会（CWI—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南非支部的一名成员，当时的工国委（CWI）南非支部也是非洲国民大会（非国大—ANC）内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流派。其主要出版物是《工人要塞》（Inqaba ya Basebenzi—workers’ fortress）。

这本手册最初是为南非支部成员所撰写的，其时的南非白人少数政权通过压迫和种族隔离（Apartheid）实施残酷统治。种族隔离制度是用于对不同种族进行隔离和歧视南非多数人口黑人的残酷制度。

作为本书的开场白，作者希望明确说明，南非当时实施的不符合标准的“班图教育模式”（Bantu Education）剥夺了黑人多数人口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这使得更需要对 1917 年俄国革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在 20 世纪 80 年代，越来越多的工人和青年们在反对种族隔离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寻找激励人心的思想，同时也需要对于苏联的错误和其原因有一个解释。

经过了数轮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后，1994 年种族隔离政权终于土崩瓦解了。而这些斗争可以溯源到 1976 年索韦托中学生反抗（最初它只是起源于一场为争取更好的教育而进行的斗争）和建立独立的和跨种族的工会，在这些抗争中工国委（CWI）南非支部发挥了作用。

工国委（CWI）美国支部社会主义选择（Socialist Alternative）在 2000 年的时候曾将这部手册扫描后发布在他们的网站上，我们在此重新发行这本手册和随附的前言，以表感谢。

就在这本小册子完成不久（的 1980 年代末），工国委（CWI）内部就史达林主义国家的危机和其可能导致的问题进行了相关讨论。1988 年 12 月工国委（CWI）在比利时召开的大会上，那些后来成为工国委（CWI）内部“多数派”的成员提出在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即“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可能性。（请见彼得·塔菲（Peter Taaffe）所著的《战斗派的崛起》（The Rise of Militant）一书 328 页）。当时“战斗派”的创始人之一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并不接受这一分析。但是，1989 年 11 月将史达林主义的东柏林与（资本主义的）西柏林分割开的著名的柏林墙倒塌了，苏联的史达林主义统治在 1991 年也崩溃了，资本主义得以复辟。本网站（www.marxist.net）上的文件是由工国委（CWI）的多数派和在史达林主义崩溃后跟随泰德·格兰特的少数派所共同制作的。

然而不幸的是泰德·格兰特并未能理解以史达林主义崩溃为标记的时代改变。在南非，资本主义政权能够顺利地、从摇摇欲坠的种族隔离政权处转移到黑人工人阶级群众运动中日益亲资本主义的领导层手中，这为其打开了大门。革命在这一阶段出轨了——这是 1988 年 12 月在比利时开会时工国委（CWI）多数派所曾经提出过的一个前景。泰德·格兰特拒绝接受这一前景展望，并在一段时间内说服了工国委（CWI）南非支部的一些领导人接受其观点。由此，当 1990 年曼德拉被释放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工国委（CWI）南非支部的一些领导人迷失了政治方向。

序

在南非托马霍尔（Tumahole）镇从事地下运动的一名年轻活动人士，只有 20 岁的本加尼（Bongani）同志的表现反映了世界各地严肃的斗士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渴求。当一名记者问他“人民教育”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是如下回答的：

“我指的是教育形式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因为，所有人都能参与到决策中从而有助于所有人的利益。”

“例如，关于 1917 年俄国革命的问题，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班图教育[南非国家当局强加给黑人的歧视性的学校教育制度]会告诉你共产主义这样那样不好，它有多糟糕。”

“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在那个阶段俄罗斯发生的真正事实……”

“你是否愿意看到在这个国家出现社会主义？”

“是的，因为它将消灭资本主义。”

“你是怎样理解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由某些个人拥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我的父母从星期一至星期五可以生产 1000 兰特（南非货币）的商品，但是他或她却只能得到 50 兰特。因此，我们的父母被人剥削，而使那些人得以致富。”

“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喜欢社会主义，因为工人阶级将控制生产。”（《金融邮报》（Financial Mail），约翰尼斯堡，1986 年 10 月 31 日）

这不是偶然现象，这位同志使用俄国革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俄国革命是迄今为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明确觉悟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推翻反动阶级统治和建立工人阶级统治的可能性。尽管资本主义媒体和教育体系竭尽抹黑之能事，但是世界各地的工人、青年和农民（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农民）都知道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发生的惊人转变，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成为超级大国。

由于这些原因，俄国革命继续鼓舞着全世界数以百万计被压迫人民以赢得他们自己的胜利。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没有其他事件包含着更对对于今天工人运动的根本性教训。

什么是“俄罗斯在那个阶段发生的真正事实？”根据什么样的纲领俄国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而这一纲领的根本性目标对于我们今天的斗争是否仍然适用？

本加尼同志称俄罗斯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何种程度上 1917 年革命的纲领得以实施？在何种程度上俄罗斯向前推动了共产主义？

具有政治觉悟的工人们都知道苏联存在严重的问题。1956 年，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曾经谴责严重的腐败和镇压，而这正式其前任史达林时代从 1920 年代到 1953 年去世期间的苏联特征。但三十年后，戈巴契夫则继续谴责苏联后来官僚主义的严重问题。

南非共产党领导人乔-斯洛夫（Joe Slovo）同志今天表示他感到“愤怒和厌恶”作为一个史达林政权的辩护者。（《观察家》报采访，伦敦，1987 年 3 月 1 日）

但是，谴责、愤怒和厌恶回答不了这个现实的问题：1917 年以后苏联发生了什么从而产生一个沉迷于大规模镇压的政权？70 年后，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建立的工人民主制度还有什么残余？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必须充分地 and 公开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对于俄国革命和其随后的堕落的关键性批评与资产阶级们对苏联的仇恨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我们需要知道“真相”以汲取教训，并正确地回应当今苏联领导人的政策。

同志们需要组织相关讨论，对这些事件和解释它们的思想进行分析，提出相关疑问和想法进行辩论。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供大家进行讨论和对进一步的阅读做一介绍。例如，手册的四部分中的每一部分都可以作为一个小组讨论的基础。个别同志可以根据相关主题（章节）进行细分后主讲。在本书末尾所列的书籍和手册可供那些有兴趣更详细了解相关问题的同志们进行进一步研究。

开展相关学习和从中吸取教训是纪念俄国革命的最好方式。

乔治-柯林斯，1987 年 10 月

第一章：俄罗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1. 十月革命

俄国首都彼得格勒，1917年10月25日晚上，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声还回荡在欧洲战场上时，俄国革命到了决定性的时刻。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和士兵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下控制了城市。孤立且声名狼藉的亲资本主义临时政府已不复存在。

在斯莫尔尼学院（之前的女子中学），工人和士兵代表组成并召开了苏维埃大会。

有些代表是职业政治家、左翼知识份子或者激进军官。但绝大多数是普通工人的代表：“衣衫破旧的士兵、沾满油污的工人，农民——穷人组成的群众，他们需要在生存的残酷斗争中摸爬滚打”（约翰·里德（John Reed），《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然而却充满了对未来革命前景的期待，和一种决意彻底终结压迫的激情。

中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指责布尔什维克，称这次大会破裂了！然而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们一个接一个以群众真正的意志和愿望将这些人的声音给淹没。

一个士兵明显感受到这一情绪：“我告诉你，拉脱维亚的士兵们已经多次说过：不要更多的决议！不要更多的空谈！我们要行动——权力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

大厅“被欢呼声所震动……”（据约翰·里德说）

在惊天动地的掌声中，布尔什维克宣布把政权移交给工人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发布一份《告工人、士兵、农民书》被广泛采纳。在公告中概括了这些当前的任务：

“苏维埃政权将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民主的和平，立即在一切战线上停战。苏维埃政权将保证把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处理；将使军队彻底民主化，以维护士兵的权利；将建立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将关心城市的粮食和农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

代表大会决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各地苏维埃应负责保证真正的革命秩序。”（约翰·里德的书中引用，第115页—第116页）

拥有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政府，以及贫困的农民群众的支持，俄国人民把他们自己从几个世纪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以此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条件。

列宁参加了当晚的大会。当他的声音终于能够在如雷的掌声中被人们听到时，他的第一句话是确认在日程表上的民主革命任务：

“我们将从现在开始构建社会主义秩序。”在此前多年的艰难斗争当中，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理论上解释了在这一任务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而现在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们得以现实的语言来解释这些理论。

列昂·托洛茨基，作为仅次于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最具权威的领导者，在列宁发言之后也表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与我们的革命能够引发欧洲革命。如果欧洲的起义者不能摧毁帝国主义，那么我们将被摧毁……或者俄国革命将能够卷起西方斗争运动的旋风，或者所有国家的资本家们将摧毁我们的革命。”（托洛茨基（L. Trotsky）《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第三卷，第315页）



一位代表写道：代表们用巨大欢呼欢迎这些发言。很明显，列宁和托洛茨基表达了当晚在斯莫尔尼学院的大多数革命斗士的想法和感受。

这样，在其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新的无产阶级政权重述了马克思主义两项基本主张——不再只是作为理论概念，而是作为国家政策的基础：

(a) 在一个像俄国那样的不发达国家里，民主和土地问题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统治来解决，而这将终结资本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

(b) 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局限在一国的范围内；它只有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才能进步。

这一小册子的其余部分是关于 10 年或 20 年后俄国革命的命运和工人民主被可怕的官僚主义专制所替代。通过认真学习这些发展，能够为现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提供及其重要的教训，也能学习了解在未来工人民主的健康政权的结构。

2. 反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最有可能首先在发达国家被击败。那里的工人阶级最强大，并且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业基础。

然而在 1917 年 10 月，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首先破裂。

布尔什维克政府继承了一个迹近崩解的落后社会，整个社会因为 3 年战争和对德国的一连串战败而消耗殆尽。

帝国主义不能容忍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挑战他们的权威的和威胁他们的利益。正如一位亲资本主义历史学家公开承认：“他们（帝国主义领袖如英国的邱吉尔和法国的福煦）警告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对国际社会非常危险的威胁，应该在它还很虚弱时将其铲除”。（J.N. 威斯特伍德（J.N. Westwood），《俄罗斯 1917-1964》（Russia 1917 to 1964），第 38 页）

在俄罗斯国内特权和反动阶级，以及劳工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者，用他们能够使用的任何方法反抗革命——抵制、经济破坏，甚至是以总罢工威胁。

通过体系化的在工厂、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委员会，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得以实现，从而对资本家行为进行了一些限制。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方式能和平地约束由革命所带来的阶级斗争的爆发。

一方面，资本家拒绝屈服于工人管理。另一方面，当工人能保证他们的权力的时候，他们不会止步于“控制”资本家。他们完全地控制了工厂，甚至还不等政府提供支援和补给。

这些斗争清楚地验证了托洛茨基在他的“不断革命”理论中阐述的前景：一旦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即使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中，就不可能把他们的纲领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工人不可避免地会发展到没收资本家资产和进行社会主义过渡。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描述了当阶级斗争加剧，俄国社会越来越趋于瘫痪：

“在 1918 年春天，俄国经济接近完全崩溃。货币失去了价值，制造产品从商店消失，由于一般的贸易通道停止运转，造成商店都关门大吉，四处遍布投机和腐败。”（瑟厄道瑞-冯-劳尔（Theodore H. von Laue），《为什么是列宁？为什么是史达林？再评俄国革命，1900-1930》（Why Lenin? Why Stalin? A Reappraisal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00-1930），第 154 页）

由于食物供应陷入瘫痪，饥荒在城市日益严重：当工业产品甚至不能通过以物易物获得，农民为什么要为城市市场种植粮食？

革命采取了它的对策。由于资本家不断的阴谋破坏与抵制，银行在 1917 年 12 月被占领和国有化。工人自发地接管越来越多的工厂，直到 1918 年 6 月法令将所有重要的工业部门国有化。

贫农委员会和武装的工人纠察队，被组织起来没收被富农（Kulaks）囤积起来的谷物。

阶级间不可调和的斗争发展成全面的力量较量。武装反革命开始出现，它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富农、资本家、沙皇残余的联合。从 1918 年 5 月一直持续到 1921 年春天，俄国内战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内战，像革命一样，强迫每个人选择立场——支持或反对政府。右翼“社会主义者”、前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憎恨超过他们对反动的恐惧（一贯如此），他们很大一部分加入到对工人国家的猛烈进攻中。

1918年3月，英国军队占领了摩尔曼斯克北部港口，在8月他们攻占阿尔汉格尔斯克，切断了俄罗斯的海上通道。在4月，日本军队在东西伯利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

“受到联合军事干预的鼓舞，”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E.H. 卡尔 (E.H. Carr) 写道“右翼社革党（所谓的社会革命党的右翼，主要由富裕农民组成）在他们在莫斯科 1918 年 5 月的会议上公开一项政策，推翻布尔什维克专制统治然后在普选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并且愿意接受协约国帮助在战争中对抗德国”——即一个亲帝国主义政府！（《布尔什维克革命 1917-1923》（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第 170 页）

孟什维克分裂成很多小团体，然而“有一点相当坚定——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充满敌意”。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 1917-1923》（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第 170 页）

在萨马拉，社革党建立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政府”并开始招募军队。在 8 月他们攻占了喀山。左翼社革党（主要由贫穷农民组成）一直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直到 1918 年 3 月，因为他们反对政府和德国签订的和约，并称其为“背叛”。

而后他们密谋反对政府。尝试挑起德国对俄罗斯进攻，他们相信这样能带来“革命战争”。由于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们在 7 月发动了叛乱，很快就被瓦解了。

西方大国，由于他们对德国的战争接近尾声，把注意力集中到俄罗斯。更多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军队登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并向西进攻到乌拉尔山脉。相当数量的法军被部署到黑海。

同时，帝国主义者资助和武装反革命军队（“白军”）——由大多数是前沙俄军官组织落后农民而形成。

维克多-瑟尔基 (Victor Serge)，当时是布尔什维克，生动地描述了 1919 年 10 月极其困难的局势：

“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指挥下的白军是西伯利亚的主人；他们组建了受邓尼金将军控制的乌克兰“最高政府”，准备进攻莫斯科。在北方，由于英国军团，他们主导了一个模糊的社会主义政府，这个政府由一个反对沙皇的老兵柴可夫斯基主持；而尤登尼奇准备攻占彼得格勒，在那里人们由于饥饿死在街上，在大歌剧院门前摆满了死马。”（《从列宁到史达林》（From Lenin to Stalin），第 31 页）

然而一年后弗兰格尔（邓尼金的继任者）军队在克里米亚被粉碎，军事威胁事实上就结束了。

布尔什维克对国内和国际联合反动势力的胜利，最开始虽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但正如许多人确信地，这却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成就之一。

这场胜利是怎样取得的？

3. 布尔什维克怎样击败反革命？

首先使俄罗斯工人国家的生存成为可能的，是国际间工人继十月革命后一连串巨大的活动。

布尔什维克者的预期得到很好的验证，欧洲被拖入一个革命时期。胜利的道路向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开放。

帝国主义者被他们本国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束缚，而不能继续他们对俄罗斯的进攻。因为这有可能导致更加激怒工人并引发士兵兵变。

匈牙利军火工人在 1918 年 1 月发动的罢工像野火一样蔓延到维也纳、柏林和整个德国，超过两百万工人参与。他们的中心要求，反映了俄罗斯工人的要求，是和平。在芬兰一个独立工人共和国宣布成立。经过数月的激战，最后在德国军队的协助下被镇压下去。

然后在 1918 年 11 月 4 日，德国基尔 (Kiel) 海军基地爆发兵变点燃了德国革命。在数天内各个主要城市控制在工人委员会手中。

这事件对俄国工人阶级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布尔什维克伊林-詹洛夫斯基，一天晚上休息去了彼得格勒 剧院，描述了对整个国家的影响的缩影：

“在一场戏开演前，一个穿着夹克和长靴的人走上舞台说：同志们！我们刚刚得到来自德国的消息。在德国爆发了革命。威廉（德国皇帝）被推翻了。一个工人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在柏林建立，向我们发了一封电报致以问候。”

“很难听到接下来说了什么……这个消息得到了剧院内数分钟雷鸣般的疯狂掌声的回应……”
（《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The Bolsheviks in Power），第 127-128 页）

在奥地利，大规模罢工和军队兵变最终粉碎了哈布斯堡皇朝政权。奥匈帝国分裂，在匈牙利革命苏维埃政府在 1919 年 3 月夺取政权。

法国到处发生大规模罢工和海军兵变。英国士兵兵变，在苏格兰核心工业区红旗被举过克莱德河，爱尔兰发生了反对英国统治的武装暴动。1919 年在美国爆发 400 万工人参加的罢工。

这些事件，很少在官方历史书中被提及，证明了一个所有社会主义者都需要理解的规律：一场胜利的工人革命有不可估量的国际影响，激怒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但同时鼓舞其他国家的工人来保卫它并效仿它。

国际团结的精神是俄国工人最有威力的武器。不是要求“民主”的道德上请愿或者资产阶级的“良心”，而是把他们同国际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赢得了大量支持，在帝国主义的后方开辟了“第二战场”。

各国士兵以同志的方式响应（俄国）革命，在俄罗斯的英国和美国军队开始兵变。在黑海，法国水兵举起红旗。帝国主义被迫撤回他们的军队而抛弃白军让他们领受自己的命运。

共产国际的早期会议（见第四部分）上呼吁国际上的工人运动采取行动反对任何对俄国白军的支持。在 1920 年 7 月，随着波兰反动军队对俄罗斯的入侵，第二次大会呼吁：

“如果你们发现，在你们的示威之后，你们国家的资本家们仍然在准备一次新的对俄罗斯的干预，那么请停止工作，停止一切运输。不要让一辆火车，一艘船只通过前往波兰。”（引自 J. 德格瑞斯（J. Degras），《共产国际 1919-1943 文件》（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 Documents），第一卷，第 113 页）

在英国，伦敦码头工人向他们的俄国同志显示了巨大的团结。他们拒绝为乔利-乔治号装载——提供给波兰白军的武器。

在 7 月，在红军击退入侵者后，英国威胁派军队到波兰。英国各地工会组织者们建立起行动委员会，威胁政府如果要进行干预就总罢工。

英国政府——在拒绝苏维埃对它的最后通牒的回应后的 48 个小时——退缩了。

在俄罗斯战场上，正如在国际政治舞台，工人的胜利只有通过布尔什维克不妥协的革命政策才有可能。

一个士兵在彼得格勒的一个群众集会上的发言清晰表述了红军建立所依靠的阶级纲领：

“士兵说：告诉我我为什么而战斗……是为了民主，还是为了资本家的掠夺？如果你能向我证明我在保卫革命，那么我就会出去战斗而不需要用死刑来强迫我。”

“当土地属于农民，工厂属于工人，权力属于苏维埃，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为何而战，我们也会为之而战！”（约翰-里德（John Reed），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第 45-46 页）

首先在斗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领导层、理论和纲领；但是接下来，在掌握这些理论的过程中每个个体担当的角色是一个关键因素，需要体现他们阶级的前进动力并向其他人指明道路。

想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展社会主义纲领的过程中的历史贡献。或者否认列宁为十月革命准备了道路都是不可能的。

同样地，也不可能否定托洛茨基作为人民委员在 1918-1925 年的战争中建立红军并领导它走向胜利的作用。

托洛茨基把红军作为革命军队组织起来，这些士兵是为政治认识而激励而不是靠盲目的服从。他对组成军队的工人、年青人和农民拥有毫不动摇的信任，这在他自己的文字中得到最好的表达：

“需要什么（来拯救革命）？很少。群众的先进部分需要了解情势危急。第一位的需要是不隐藏任何东西，我们的任何弱点。不是和群众玩文字游戏，而是直白地表明每一件事。”（托洛茨基《我的一生》（My Life）第 43 页）

具有牺牲精神的年轻工人被吸收到军队成为先锋。托洛茨基接着写道：

“苏维埃，党、工会从他们的人员中建立新的纵队，并派出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者（到前线）。大多数年轻党员都不知道如何拿枪，但他们有赢的意愿，而那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们在军队柔软的身体里插入脊梁。”



“求胜的意志”是“最重要的东西”，武器的使用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学会，但求胜的意志只能出于一个足以为之战斗的目标、清晰的战斗目标，以及理解如何实现目标。

布尔什维克们有能获胜的士气，而这个重要的因素显然在白军那儿是缺乏的。即使是亲资本主义的威斯伍德（Westwood）也不得不承认：“在弗兰格尔掌控白军的剩余部队之前（注：几乎已是内战的尾声），军官们为士兵们立下了完美的典范，那是酗酒、抢劫和暴力。残暴地对待地方居民，明显意图恢复地主制的表现，白军与农民间巨大的社会鸿沟使得后者偏向红军”（《俄国 1917 年到 1964 年》（Russia 1917 to 1964））

于是反革命最初的攻击被击败了。但布尔什维克们了解到，他们的胜利只不过是在斗争中提供了一丝喘息的机会。正如列宁在 1920 年的评论：

“我们现在脱离了战争进入和平，但我们没有忘记战争会再来。只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存在，我们就

无法和平共存。最后两者之一必会胜出。”（引自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第 3 卷，第 365 页）

问题讨论

1. 为何革命发生在落后的俄国，而非英国或德国这些工人阶级更强大的国家？
2. 如果 1917 年列宁与托洛茨基不在俄国，事态将会如何？
3. 革命之所以发生在俄国是因为她独特的状况，厌战情绪、饥荒以及无地农民。那么，这些不会在这里发生吗？
4. 三年的内战是否显示布尔什维克只有极少部分人的支援？
5. 布尔什维克如何在内战中面对军事上更为强大的敌人？

第二章：工人国家的孤立与堕落

4. 在国际斗争中的挫折

在十月革命后的强大阶级运动中，推翻全欧洲的资本主义被提上了行程表。

工人阶级在已开发国家的胜利，能够回过头来提升俄国当时落后的经济基础，并且消灭帝国主义入侵的威胁。

在团结工人以及将工人导向不同国家实际行动并且指导对抗世界资本主义联盟的意义上，一个国际组织都是必要的。

而第二国际此时已经失去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能力，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

工人阶级的领导危机

在 1914 年之前，第二国际曾以一切手段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包括总罢工。然而，当战争开始之后，其绝大多数领导却站出来积极或消极地支持他们“自己的”政府。

是什么造成了这场代价惨重的背叛？

第二国际成立于 1889 年，作为（主要是欧洲）社会民主党联盟，一般而言接受马克思主义。它在帝国主义扩张期以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稳定成长之时成立，这对它的性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第二国际的旗帜下，曾有过许多重要的斗争。主要赢得的资本家们的妥协有，例如民主权力、更高的工资、较好的劳动条件等等。而工人贵族—拥有技术并且薪资略高的工人—也在这段过程中出现。而工运的领导层，也越来越多出自于这个阶层以及那些想在工运中发展的知识份子。

由于远离工人的日常斗争，这些领导人越来越习惯于处在国会议员或政党和工会官员的高薪职位上。无法避免地，他们的思想日益被周遭的环境所影响。他们的意见总结起来，就成为德国社民党伯恩斯坦所推动的改良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可以经由议会路线，逐步和平地被取代。

这意味着那些想要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全部可以摆到后面。“斗争”可以在议会的沙发上进行—由那些领着国家高薪的人来进行！

改良主义接受越来越多的不良部分。不可避免地，它促使人们越来越与资产阶级合作。工人领袖和各种不同的国家机关扯上关系。公共部门的职位给了他们新的特权。

在这些压力影响下，导致了他们产生民族主义的视角。社会民主党人越来越局限在国家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层次，和国际运动的连结也仅限于情感或文字上的支援。

在 1914 年八月，政治上逐步的腐化终于爆发出悲剧性的结果，这些改良主义者毫无异议地靠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旁边，从此开始，改良主义者公开的反对工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意图。

在 1919 年初，一封历史性的信发送到了各国革命的工人组织手中。由列宁和托洛茨基署名，代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的新名)邀请各国工人组织到莫斯科参加大会，其目的解释如下：

“大会必须建立成一个共同的阵线，以维持整个运动的协调与领导，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心，协调各地区的利益使其符合世界革命的利益”（引自德格瑞斯 (Degras)，第 1 卷，第 5 页）

在这次大会上，1919 年 3 月 2 号到 6 号，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

“共产国际的平台”在成立大会被接受。



“帝国主义制度正在崩溃，殖民地的动乱，各从属小国的动乱，无产阶级在一些国家的胜利，帝国主义军队的瓦解…这就是今天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所面对的问题。

“世界上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拯救[人性]，就是无产阶级…它必须建立真正的秩序，共产主义的秩序。它必须破坏资本的统治，使战争不再发生，取消国家边界，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合作的社区…”

“各国革命运动正在成长，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将可能会摧毁整个运动…最终必须协调各国无产阶级的行动，而这些都指向一个目标——必须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

“国际…将实现不同国家无产阶级的互助…将支持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对抗帝国主义，以推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崩坏。”

工人阶级在 1918-19 年间取得的进步，仅仅标示了未来长久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开始。当蔓延全欧的阶级斗争开始退潮之时，工人们便无法维持他们之前所争取到的果实。

这一系列的失败有两个主要因素：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人恶意的背叛，其次是由于俄国以外的革命浪潮尚不够成熟，换句话说，即使是在第三国际中的政党有些也缺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导。

在德国，大部份工人仍然对改良主义社民党存有幻想。在 1918 年 11 月，由诺斯克和谢德曼为首的改良主义者，自觉地成为了反革命意识的代理人。

他们的策略是说服工人阶级接受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的权威。然后，他们重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部队，击碎了工人的委员会。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德国工人革命运动的杰出领袖，1919 年一月被他们的“前同志”所释放出的军事反革命力量所谋杀。

德国的资产阶级仍然薄弱，而工人运动也尚未被击溃。在大势底定之前，还经过了许多的斗争。

在 1921 年的第三届世界大会，共产国际的成员数暴增，共有五十一个国家支部，两百八十万会员（其中仅五十五万在苏联）。

许多不同的政治势力都加入了国际，从中派主义（居于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在文字上同意马克思主义，但在实践上摇摆不定）到极左派都有。

在匈牙利，当地共产党的极左错误导致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尝试失败，他们拒绝将土地分给农民，而教条地坚持将地主土地集体化，于是他们无法赢得农民的支持，而无法团结整个国家。

当反革命以罗马尼亚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入侵的形式袭来之时，农民们不愿为这个拒绝他们最基本要求的政府作战。

在 1919 年 8 月，经过 4 个月英勇抵抗，工人共和国落败。工人运动遭到随后兴起反动恐怖势力的可怕大屠杀。

在意大利，正是那些软弱缺乏骨气的中派主义工人“革命”领导者使胜利变得不可能。

1920 年一波大规模占领工厂的行动创造出了革命的形势，苏维埃控制了工厂，赤卫队护卫着他们。资本主义国家被瘫痪。当时的任务就是动员并武装工人去夺取政权。

意大利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们因下层的压力所迫宣称支持共产国际。事实上他们是分裂的，而“最高纲领”（左）派甚至拒绝领导斗争。主动权被交给改良主义者，而他们如同以往一样又将权力交还给资本家——只换来了暂时性的让步。

在法国、爱尔兰、英国、荷兰及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计划在改良主义工人运动领导者们的帮助下夺回控制权。各种例子表明，这只有在缺乏能够把握住大量的机会及孤立改良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时才有可能，如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所做的一样。

在 1921 年，工人们在国际上的奋斗陷入了暂时性的低潮。一个奇特且危险的力量对比的相互关系出现：一方面，资产阶级巩固了在国际间的地位；另一方面，俄国的工人国家孤立且精疲力尽。

5. 苏维埃民主的枯竭

俄罗斯工人国家在内战中存活下来，然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20年，大规模工业的产量下降到1913年水准的14%，而制造业产量小于13%。农业产量在1917到1921年间进一步下降了16%。钢产量只相当于1913年产量的5%。

1921年和1922年饥荒遍布俄罗斯的东部和东南部，导致了500万人死亡，并使孤立的社区变得野蛮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1917年的革命势头变成绝望，这把社会转变成需要为生存而严酷斗争的社会。

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治民主无法得以继续维持。每一样所需要的资源和人力都要求通过严格的集中制进行指令控制。此外，一场革命的内战不仅需要军事前线战斗，而且同样需要在后方对抗支援反革命的社会集团。

十月革命依赖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农民支持工人国家是因为它给与了他们和平和土地。然而战争的损失腐蚀着农民对革命的支持。工业品变得极其缺乏，而同时需要从农民那里强征食品以供应红军和城市。只是由于白军的野蛮和他们企图将土地交还给地主阻止了大部分的农民走向反革命。



当社会分裂而工人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之时，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已不能得到维持。敌对分子在群众中四处煽动不满可能使整个国家引向叛乱的深渊，并为反革命敞开大门。对此托洛茨基解释道：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新闻出版不是抽象的社会工具，而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武装的互相对抗的对立面的武器。我们消灭了反革命的新闻出版，就如同我们摧毁它的据点、它的物质储备、它的通讯系统和它的情报系统一样。”（《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第80页）

这段时期就是人们所知的“战时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全国的消费品极度缺乏，因而必须严格地控制。同时，出于对德国工人阶级胜利的期待，苏维埃政府希望直接从对分配的管理过渡到对生产的管理，而把战时共产主义作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起点。

改良主义者和前马克思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被迫采取的粉碎反革命的残酷手段提出强烈抗议。他们问在布尔什维克和旧的沙皇专制的手段之间有什么不同？托洛茨基回答：

“你们对此不理解吗，圣人们？我们会向你们做出解释的。沙皇的恐怖扼杀了工人们为社会主义秩序而进行的斗争。而我们的“肃反委员会”枪决那些为重建资本主义秩序而反扑的地主、资本家和将军。你们把握了这些差别了吗…？是吗？对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这些差别完全是足够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第78页-79页）

然而镇压被布尔什维克看作迫于近在咫尺的反革命危险才使用的临时的和特别的手段。即使在这样危机的条件下，他们仍然保持对政治反对派和解的态度，只要他们在实践中支持工人国家，并在此基础上为他们的政策进行斗争。

在任何时期布尔什维克都没有提出“一党制国家”的概念，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无法找到其相关来源。

然而，在实践中那些支持革命的人大多数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而反对党日益彻底堕落成为工人国家的敌人。他们斗争过并失败了。

由于参与反革命活动，在1918年6月苏维埃从开除了右翼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直到1920年8月孟什维克还可以在莫斯科举行他们的党代会，并且得到了媒体的报导。但到了1921年，大多数孟什维克领导人离开了俄罗斯而在国外领导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运动。

1921年的共产党代表大会认识到需要重建工人民主。但工人民主的基础——工人阶级的统一、组织和革命能量——却被为赢得战争所需要的超人的精力耗竭了。

工业的崩溃意味着工人大军的消亡：

“到 1919 年产业工人的数量下降到 1917 年水准的 76%……到 1920 年总的来说产业工人的数量从 1917 年的 300 万人下降到 124 万人，即还不到 1917 年的一半。在两年间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的人数下降了一半。”（艾伦-伍兹（Alan Woods）和泰德-格兰特（Edward “Ted” Grant）合着的《列宁与托洛茨基：他们真正代表什么》（Lenin and Trotsky: What They Really Stood For），第 75 页）

工人阶级的政治干部——曾经动员他们的工友、组织罢工、拿起武器，创造和领导苏维埃的具有阶级觉悟的积极分子——几乎被完全消灭。正如伊林-詹涅夫斯基（Ilyin Zhenevsky）在战争开始时在彼得格勒的记录：

“前线需要增援——包括普通的红军士兵和领导人员……彼得格勒委员会派了 300 人（我们党的优秀成员）。我们不得不牺牲我们最好的力量以满足前线的要求。（《掌握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第 116-117 页）

数以千计的革命干部在战争中牺牲。大多数幸存者被工人国家的政府部门所吸收。工厂中保留的劳动力转变成 1917 年革命先锋队的对立面。早在 1919 年一位参加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就警告说：

“我们观察到在大量工业中心里的工人是从农民群众中吸收进来的，我们得到取代工人的人口，仍然是半个农民的工人，甚至有时完全就是农民。”（同样引自伍兹和格兰特的作品，第 75 页）

由于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死亡和消失，而使用不成熟的半农民劳动力代替，并在工厂中用破旧的设备昼夜不停地生产和面临持续的短缺，苏维埃停止了运转。

全俄苏维埃大会原定是每 3 个月召开一次，而 1918 年全年只召开了一次，即使这样召开的会议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准备。

由于极度的疲劳，令群众不再有能力直接行使权力。这一点对俄罗斯工人国家的堕落起着决定性作用。

然而可能有人问：难道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国家仍然是执行工人阶级政策的工具吗？他们掌握权力——为什么他们无法铲除官僚主义并执行社会主义的政策？

这个问题同样对澄清另一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如果没有群众性的工人阶级参与管理一切国家机关，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不可能出现。

下面三个章将在更多细节的基础上审视布尔什维克面对的客观障碍和由于缺乏正常运作的苏维埃的条件下控制国家机器的局限性，以及共产党自身变化产生的影响。

6. 官僚和工人国家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不久就在他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中非常精彩地解释了工人国家的特征：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国家与革命》第 107 页-110 页）

作为一个特殊的进行镇压和统治的正在“消亡的”或者“萎缩的”机关国家——把武装的人从人民群众中分离出来，——是工人统治的政治措施。列宁总结了这一点的含义：

“自然，剥削者没有极复杂的机器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需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需要有简单的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同上，第 110 页）

在实践中这个“简单的机器”是如何工作的？劳动者如何才能掌控他们创造的国家并防止军事和官僚精英的增长呢？列宁的基本准则在今天仍然像当年写下的时候一样适用：

- “1. 任何官员的工资不得高于熟练工人工资的平均水准……”
- “2. 管理职责需要在人口中的最广泛阶层中轮流行使以防止一个牢固的官僚等级的形成。”
- “3. 所有工人携带武器保卫革命对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任何集团的威胁。”

“4. 所有权力都由苏维埃赋予。苏维埃由来自工作场所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可以被随时召回，而且代表们被要求在他们工厂的群众会议上向工友们汇报参加苏维埃会议的情况……这样保证广泛的群众参与。”（罗格-西尔弗曼（Roger Silverman）和泰德-格兰特（Edward “Ted” Grant）的《官僚主义还是工人的权力？》第 3 页）

革命摧毁了旧的沙皇国家，并在政府高层和军队内清除最反动的将军和贵族。只要可能，共产主义者想法取代他们的位置。

但是对处在孤立中的苏联所拥有的资源条件下，国家机器彻底的转变是不可能的。1917 年 2 月布尔什维克只有 23,600 名。而其中只有少数构成了这个党的干部，领导其他人为党的政策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国家机器有多达数十万的官员。

旧政权中的“专家”和熟练行政人员无法被替代：他们不得保留，甚至需要以特权贿赂他们为代价。例如在 1918 年维亚特卡市（Vyatka，现名基洛夫市）里，在 4766 名官员中至少有 4476 名就是以前为沙皇政权服务的官员。

托洛茨基在他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解释了当时所发生的重要影响。

工人国家，他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座桥梁”。它的任务是通过有计划的使用资源，创造一个富足的社会；通过这一阶段，阶级差异——与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关国家本身——将会消失。

在第一个阶段，工人国家必须通过使用它从资本主义处继承而来的经济手段进行运作。它必须使用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训练出来的有技术的人员和一些资本主义的方式运行：劳动分工、支付报酬，等等。

于是整个工人国家的发展可以归结由“资本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之间的关系变化”所决定的。（《被背叛的革命》第 54 页），——即旧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残余因素与它自上而下的控制方式和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的发展（两者间关系所决定的）。只有工人在社会中不断增加的权力才能清除资本主义的残余。

然而在落后的俄罗斯，苏维埃不再作为武装的人民的机构而存在。日复一日管理权落入非共产主义的官僚大军手中，并再次表现出成为社会中特权阶层的前景。

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一个落后国家的官僚是其本身落后的产物——工人阶级的软弱、缺乏技巧以及政府官僚在政权中享有的地位：

“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缺乏消费品，因此便引起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如果商店里的货物充足，购买者就可以随时去买。如果货物很少，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而在队排得很长的時候，就必须指派一个警员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苏维埃官僚的权力的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须等待。”

（《被背叛的革命》第 112 页）

因此，在一个孤立而落后的工人国家中，官僚并没有简单地变成多余或“消亡”。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不发达”的工人阶级无法接管官僚的功能，所以官僚取得——至少在一个阶段内——其存在的客观基础。

通过官僚，反动阶级的压力在俄罗斯工人国家之上和之内得以充分发挥。日益明显的是由于苏维埃的筋疲力尽使得官僚有更多的自由为所欲为。在共产党内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日益陷入艰难的对抗官僚的行动中。

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为疾病所折磨，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形势的威胁。在 1922 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对国际代表作出了如下对俄罗斯的状况的坦率评价：

“毫无疑问，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为什么我们会干出蠢事来呢？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第一，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第二，我国的教育程度极低。第三，我们得不到外援。没有一个文明国家帮助我们，相反地，它们都在反对我们。第四，由于我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过错。我们接收了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不幸。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常常反对我们。…现在我们有一大批职员，但是缺乏有相当真才实学的人来切实地管理他们。”（列宁《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 19 页）

关于“真才实学的人”，列宁指的是共产主义工人，有组织的而且能够控制那些“专家”。列宁无法对这一问题提供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因为在俄罗斯一国之内没有这样的方案存在。

列宁说过：“在我们的一切鼓动之中，……必须解释说：……我们遇着的灾难乃是一种国际的灾难，若非国际革命便无从解决。”（引自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

换言之，只有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并向他们在俄罗斯的兄弟姐妹提供大量的技术援助，才能清除官僚政权的基础。

7. 党内民主

苏维埃工人阶级的精疲力竭使得共产党及其领导层有了一个关键的责任——保卫革命的成果。

战争环境摧毁了苏维埃——工人国家的基本机构。到了 1921 年，甚至苏维埃大会执行委员会每年也只举行 3 次会议。人民委员会（Sovnarkom，或者说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有效机关而得以保留。

人民委员会由选举产生的负责领导的共产党员组成，以执行党的政策。自然他们也在党的纪律下行动。换言之，党作为工人国家的核心和支柱得以保留下来。权威必要地集中在中央委员会的手中，其后集中到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手中——这种极端的集中是战争的后果。

托洛茨基在 1920 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以与波兰签订和平条约为例说明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

“谁决定这一问题？我们有人民委员会，但是它必须被有效地控制。谁的控制？是由作为混乱而无组织的群众的工人阶级进行控制？不是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被召集起来以讨论提议和决定是否作出回应。”（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Carr）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226 页）

虽然权力集中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而且他们立场坚定；但并没有退化为自上而下的系统化的官僚体制。

党和其干部是通过斗争把大量分散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而组建的，它们都围绕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但有各自自己的领导层和理念。建立的方法是讨论。成员和团体（“派别”或“倾向”）的权利得到绝对的保障，他们可以向领导层提出疑问，并在有组织的条件下宣传他们的理念。

例如，在 1918 年“左翼共产主义者”反对派在党内关于是否与德国签订和约的尖锐辩论中脱颖而出。有两周他们在彼得格勒发行自己的日报，在莫斯科他们赢得对当地党组织的控制。然而当内战开始后，左翼反对派和党的其他群体一起全部投入斗争中。

伊林-詹涅夫斯基（Ilyin Zhenevsky）很好地描述了早期工人民主得以无限制的膨胀的情况：

“人民委员[部长]……在很多时候不是发出命令而是向他的下级行政机关提出请求。而这个机关本身可能不同意人民委员的意见，而拒绝他的请求。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在政务处理上广泛的民主主义表达为权力在基层这样的口号。”（《掌握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第 30 页）

即使在红军中，批评托洛茨基领导的——基本上是游击战支持者——也能组织他们自己的“军事反对派”，并为他们的观点进行宣传。最终他们被争论和事例所击败。

在 1920 年后期出现了所谓的工人反对派。其纲领被卡尔（E.H.Carr）概括为“当前各种不满的大杂烩，主要是旨在反对日益集中化的经济和政治控制”。（《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第 203 页）

他们的观点在党的出版物上得以发表，日复一日，持续了几个月。说明他们想法的手册得以在 1921 年 3 月的党代会上传阅，在会上这些问题得以广泛讨论。

但是大会的议程却戏剧性地被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的水兵叛乱所中断，喀琅施塔得是芬兰湾里面向彼得格勒的一个海岛。

喀琅施塔得叛乱

1917 年喀琅施塔得水兵战斗在革命的最前线。到了 1921 年那一代人去了战争前线而被入伍的农民所取代，新的水兵在政治上缺乏经验并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被农民的怨恨所影响，他们要求更大的自由却无法提出解决这个国家问题的纲领，并在“打倒布尔什维克暴政”的口号下进行武装叛乱。

这对于工人国家来说，比起当时散布国内各地的武装叛军联合起来表现出更严重的威胁。喀琅施塔得控制着彼得格勒的交通要道。一旦喀琅施塔得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彼得格勒将无法进行防御。这给与了白军和帝国主义者攻击革命关键中心独一无二的机会。

当时芬兰湾仍然封冻着，由重炮和波罗的海舰队守卫的要塞而坚不可摧。解决这场危机的时间非常短。

海员拒绝投降。受到党的领导层一致支持的托洛茨基发出进攻的命令。在数天的残酷战斗后，喀琅施塔得被布尔什维克的部队所夺取。

苏联的生存再次命悬一线。这种叛乱会蔓延吗？对于党代会上的代表来说，清楚的是一个联合起来的坚固领导层是必需的。在这时党内公开的分歧会被敌人用来迷惑工人和农民。因此决定党内有组织的派别必须解散。

列宁在一年后概括了这一前所未有的立场的基础：

“如果我们不回避现实，我们必须承认当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由其成员所决定的，而是由一个由被称为“党的老卫士”的小团体的联合的巨大威信决定的。在这个团体中极小的冲突即使不足以摧毁它的威信，也将在所有事件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威信从而让这个团体失去决策的权力。”（英文版本《列宁全集》，33卷，257页）

其中关键的词语是“目前”。布尔什维克知道问题无法单独通过组织化的措施解决；在更长的时间里，统一只能建立在讨论、教育和共识的基础上。否认自组派别的权利只有在处置迫在眉睫的危机时作为紧急措施是正当的，而一旦形势再次得到控制时就应立即予以废除。

8. 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

喀琅施塔得叛乱显示出农民由于战争时期的牺牲、物资短缺和强加的强制征用而产生爆炸性的愤怒。当时，西方工人阶级革命没有立即实现重大突破的前景。很明显，如果这个国家继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就不可能不冒着发生大量叛乱的风险。

列宁，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概括了这一形势：

“如果我们能够明天就提供 10 万台一流的拖拉机（并提供它们需要的汽油和机械部件）……中农们就会说“我支持共产主义。”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击败国际资产阶级，强迫他们给我们这些拖拉机。”

（1919 年三月 18 日到 223 日的俄共（布）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6. 农村工作的报告》）

1921 年 3 月的第十次党代会看不到任何除了废除战时共产主义的其他选择（最初由托洛茨基在前一年提出）并采纳了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一系列对主宰农业生产的资本家和富农的让步。用市场的利润刺激他们市场提高产量，作为供应城市和复苏工业的方式。

新经济政策毫无疑问成功地激化了部分经济。到 1922 年工业产出达到 1913 年的 25%，尽管主要在供应农民需求的轻工业领域。

在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造成工人向着集体化和经济的中央计划关键转变的严重退步。它极大地增强了所谓的“新经济人”——一代中间人，利用持续性的短缺来投机而填满自己的口袋。

俄罗斯社会的力量天平越来越不利于工人阶级。富农和新经济人与国家官僚分享了部分特权。这些阶层变得越来越自信并决定巩固他们的地位。他们对工人领袖的压力越来越大。

维克多-瑟尔基描述了这一扭曲的现实：

“阶级分化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重生：在等级的最下层，失业者每月领取 24 卢布；在顶层，工程师领取 800 卢布；在两者之间，党的公务员领取 222 卢布，但却可以获得许多免费的东西……这里有极端的痛心疾首的贫穷而富人们却傲慢和自满……年轻人酗酒、老人酗酒、而酗酒变成瘟疫。最糟糕的是我们不再能认识这个当初革命的党了。”（《从列宁到史达林》）



官僚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不够成一个阶级（即一个在生产系统中发挥必要作用的社会集团）。它已经退化成一个寄生阶层，利用技能的短缺来索要特权。

不可避免的是在国家机关中得到加强的“傲慢自满的官僚”和还活着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加剧。当权力还保留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时，官僚无法安心。一场对共产党控制权的斗争在这种局势下产生。

在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干部由于公共事务的需要把能力用到极点，而党的队伍却被大量涌来的新成员充满。党员从 1917 年二月的 2.36 万人增加到 1918 年初的 11.5 万，而在 1922 年 3 月增加到 65 万。

许多当初入党的人（特别是在内战的黑暗时期）是充满战斗性的工人和被这个革命党吸引的年轻人。然而慢慢地，为实现他们政治野心的寻找新工具的前孟什维克、官僚、新经济人和其他敌对因素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共产党。

早在 1919 年 3 月的第八次党代会就认识到了这一危险：

“并不够格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是完全“寄生”的人大量进入党。俄罗斯共产党掌握权力，因而不可避免地吸引（不光是相对优秀分子，同时也包括那些为个人履历而钻营的分子……”

“在苏维埃和党组织进行一次严肃地清洗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第 212 页）

党的内部斗争在战争时期发生在幕后。清洗最终在 1921-1922 年进行。不像后来对付反对派的野蛮的官僚主义的攻击（同样被称为“清洗”），它由基层党组织的党员认真考察，通过观察党员的付出和活动发现谁才是共产主义者。

第八次代表大会另外决定在 1920 年 2 月建立工农监察委员会（“Rabkrin”），其任务是和“苏维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作斗争。

大会指定约瑟夫-史达林（一个老党员，虽然不是理论家却是很好的组织者，其在党外几乎不为人知）为管理新部门的人民委员。在 1922 年史达林被任命担任另一个重要的管理职位：总书记。

Rabkrin 完全失败。实际上它的成员，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是由“在其他领域失败的工人”组成的。或者如列宁评论的：“最好的工人都前线去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第 232-233 页）

然而有更多根本性的原因使得官僚主义腐蚀的趋势无法遏制。

俄罗斯的落后反映到政治上是无产阶级（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相对于农民和反动阶级的软弱。正如列宁指出：

“只要我们还是一个由小农组成的国家，在俄罗斯资本主义就有比共产主义更坚固的基础。”（《联合的反对派的舞台》第 6 页）

苏维埃工人阶级的社会弱点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克服；国家机器中资产阶级的压力无法通过另建一个新的官僚体系来清除。解决方法只能是通过国际革命的有利条件下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重生。

官僚的影响日益遍布党内。许多共产党员被复杂的行政工作吸收，已经被官僚所“领导”。

即使党的领导层也在压力之下采纳对官僚的“实际”要求，把精力集中到通过组织手段在俄罗斯建立稳定而把世界革命扔到脑后。

列宁，在他政治生命的最后时期，变得日益地担心官僚权力的危险。在 1922 年的 11 届党代会（他最后一次参加的党代会）上，他发出这样的警告：

“[国家]机器拒绝服从领导它的手。正如一辆不是向司机希望的方向而是向其他人希望的方向行驶的汽车。他被一些隐秘不遵守法律的手驾驶……或许是一个投机者，或者一个私人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英文版《列宁选集》，33 卷，第 279 页）

史达林在这一时期走上前台。不是由于他个人的人格和能力，甚至不是由于他刻意为之，把这样一个无特点的个人转变成后来的独裁者。史达林赢得权力完全是社会和国家中力量平衡变化的结果。

工人国家的官僚开始孤立“社会主义趋势”，工人的领导层的堕落因素是它的政治弱点。史达林对于官僚来说是一个“表现一贯而可信赖的”的关键官员。正如托洛茨基解释的：

“（史达林给官僚）带来了所有需要的保证：老布尔什维克的威信，坚定的性格，狭窄的视野，和国家机器的紧密联系……新统治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态度也是他自己的态度。他深信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本质上是一国的和行政性的。”（《被背叛的革命》）

内战带来的罕见的权力集中对于官僚来说是政府自然的管理方法。这给他们提供保护他们的特权不受未来工人阶级控制威胁的手段。

史达林在将党机关内任职的官僚纠集起来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 1922 年开始，他系统性地把他的追随者任命为支部、地区和省级的书记。这使他得以有效地控制日常政治实施、会议组织、党代会代表的选举的。

这些诡计为他与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残余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正面冲突铺平了道路。

9. 转折点

1923-1924 年见证了在苏联内的一个转折点：国家和党内的矛盾爆发成为决定性的政治斗争。

在一系列中风后，1922 年底列宁病情十分严重。已经不能确定他何时或者是否能重新进行政治活动。

官僚敌视和担心托洛茨基——在党内仅次于列宁最具权威和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然而一些“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被政治短见、个人野心和忠诚，他们不愿看到由于列宁的缺席托洛茨基取代列宁在政治局的领导地位。

在 1922 年 12 月，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主席）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紧密合作者）和史达林组成一个秘密的派别（后来被成为“三人团”或“三人领导小组”），其明确目的是密谋反对托洛茨基。这给了他们在 6 人组成的政治局一个有效的多数，成为中央委员会和整个党的领导权威。

是列宁，在他的病床上首先感觉到发生了什么，并展开了与史达林和官僚的斗争。

1922 年 11 月 25 日列宁在一张便条（后来被称为他的“遗嘱”）上写道：“史达林同志成为了总书记，在他的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威，而我不确信他是否能总是足够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十天后他补充道：

“史达林太鲁莽，这一缺点虽然在我们共产主义者中间当然能够接受，然而作为总书记这一缺点是无法容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同志们考虑让史达林离开当前的职位而让其它的同志代替，那个同志只需要比史达林多一个优点——更具有容忍心、更忠诚、更礼貌、更多的考虑其他同志，不是那么反复无常等等。这种情况或许表现为一个可以忽略的细节。但是我是从防止分裂的角度考虑的……这不是一个细节问题，也不者一个想像成决定性因素的琐事。”（《列宁选集》）

列宁担心史达林是否能够胜任，但并没有写出什么是“决定性因素”。但是这除了意味着他认为史达林会和党内马克思主义最好的代表冲突，而发现自己成为敌对力量——富农、官僚、“资本家”和“投机者”——的工具外，还能有什么？

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列宁要求在任命史达林为总书记之后这么快要求他离职。

然而列宁临近死亡，史达林和他的派别变的日益傲慢，滥用他们的权力违反一切党的传统。

1922 年 1 月 30 日史达林官僚把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正式纳入苏联并对当地布尔什维克领导进行镇压。当列宁发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感觉到反对党内异化趋势的斗争不能再推迟了。

由于重病无法参加 1923 年四月的第 12 届党代会，列宁托付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辩护并发出反对史达林的“爆炸新闻”的任务。

然而史达林退却了，接受了所有托洛茨基的批评并纠正了他在民族问题上的表述。托洛茨基由于这一点不情愿在发起对史达林的公开攻击。因为其可能被看作争夺列宁位置的“权力斗争”并有可能产生分裂党的危险。

这样对抗就推迟了。不久之后列宁再次中风而从政治活动上消失直到他在 1924 年 1 月去世。

此后数月在党内爆发了关于两个核心问题：党的民主和经济政策。

在大会上托洛茨基描述了新经济政策整体状况。并指出在工业生产方面存在的危险。他用一幅工业和农业价格变化的示意图才说明他的观点。其表现为一把张开的剪刀：农业价格是一条下降的线，而工业价格是一条上升的线。

到了 1923 年 3 月，工业价格达到 1913 年水准的 140%，而农业价格下降到不到 1913 年的 80%。这一问题后来被称为“剪刀差”。

如果工业产值持续下降而价格持续上升，托洛茨基警告道，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

大会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要在新经济政策框架下进行一个新的变化的意见；在中央计划的基础上发展国有部门并扩增工业，最终吸收和消除私有部门。

然而这一政策变成一纸空文。和“私有部门”存在共同特权的官僚不希望去虚弱它。实际上他们和以前一样依赖富农由于利润的刺激提高产量。

在 7 月和 8 月发生了罢工潮，工人们发泄他们对他们的严酷环境的不满。其中的领导者——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被官僚下令逮捕。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党内的不健康达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准。

托洛茨基发出了警告。“关押反对派，”他解释道：“不能解决任何事情，冲突的原因仍然存在：缺乏经济控制，在党之上的官僚控制。”

“当前的政权”，托洛茨基在 10 月 8 日向中央委员会写道，“比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时期更加远离任何工人民主。”（《1923 年反对派档案》，第 2 页）从上面任命的书记们组成的等级“捏造党的观点”，支配普通工人，并确保批评观点不会被真正听到。

在托洛茨基抗议的日子里，一项声明被其他 46 名党的领导成员发出，表达了他们对政治局方针的批评和多种纠正它的提议。

维克多-瑟尔基（1923 年反对派成员），解释了他们的普遍观点：

“这个国家接近一场无可挽回的危机，这场危机可能导致 1.2 亿农民起来反对社会主义政权，在外国资本的仁慈下取代它的是强迫该国进口（靠贷款？什么条件下的贷款？）大量工业品。为了防止这场危机，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采取措施。”

这些措施是：

- (1) 重建党内的民主，这样工人的影响才能感受到；公开讨论国家机关。这是任何经济措施成功的显而易见的条件。
- (2) 采纳工业化和在未来数年相当程度地重建工业的计划。
- (3) 为了给工业化提供足够的资源，强迫富裕农民把他们的粮食交给国家”（《从列宁到史达林》第 40 页）

这使得党内斗争的分界线变的更加清楚。这是一场对立的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一个是基于工人阶级的趋势，另一个保卫“勤劳小农”和特权集团。

“三人团”和他们的支持者由于挑战陷入混乱。46 人的声明打破所有党的先例而遭到禁止，而托洛茨基被指责“发起”了这项声明。

然而在党的大多数的压力下（包括军队和年轻人），官僚被迫退却。他们在纸上接受了反对派的要求，宣布一个在党内自由和民主的“新方向”，同时把权力的缰绳紧紧握在手中。

托洛茨基在 11 月 8 日的对党员的公开信中警告纸上的“新方向”是不够的，党不能回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上除非普通工人——特别是年轻人——采取行动“改进和修复党的机关”。（《新方向》，第 71 页）

这封信在党的工人中激发了巨大的热情——而对于官僚来说却是宣战。争论将在 1924 年 1 月第 13 届大会上解决。

然而苏维埃政党内部的斗争被 1923 年在德国的发展决定性阻断。

10. 德国革命的失败

德国易碎的稳定在 1923 年 1 月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工业区后破灭。在法国军队的枪口威胁下德国帝国主义者被勒索“战争赔款”作为他们在世界大战中失败的代价。

德国的经济跌入低谷。已经在 1922 年直冲云霄的通货膨胀在 1922-1923 年间变成了一个天文数字——大约增长百分之 1,000,000,000,000,000!

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工人阶级急剧地向左转。工厂委员会和改良主义工会领导对立起来。德国共产党增加了几万人。“无产阶级百人团”（工人武装）成立，到了当年秋季就吸引了 6 万名工人，而且拥有 1.1 万支步枪（根据资本家的估计）。

在萨克森和色林吉亚两个州，由于德共的支持左翼社民党政府掌握政权。

8 月 11 日的大罢工推翻了柏林的右翼的古诺政府。德国处在革命的关口。

工人的领导层没有做好准备。德共的领导层分裂成“中间派”、“左派”和“右派”，而把谨慎的布兰德勒 (Brandler) 作为党首。优柔寡断和变化无常成为政策的特点。

共产国际日益被苏维埃党内的斗争所影响。官僚的保守和短视开始通过苏维埃党的领导层传播到各个地方。

共产国际在德国的代表拉狄克 (Radek) 全力支持布兰德勒。直到 7 月史达林还建议“德国人应该保持克制而不要冲动”。（《1923-1924 年间的空位期》(The Interregnum 1923-1924) 第 195 页）

直到古诺政府倒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ECCI) 才采纳了托洛茨基的意见——夺取政权的斗争在德国的议事日程之上，需要为武装暴动做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

然而可悲的是这一政策并没有被贯彻。托洛茨基概括了所发生的：

“为什么德国革命没有成功？失败的原因完全出在策略上，而不是当时存在的社会条件上。这就是一个没有被把握住的革命形势的经典例子。德国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经历了所有的这些事情之后，只有当它确信这次问题能被决定性的解决而且共产党在为斗争作准备并能赢得胜利它才能被引向一个关键性的斗争。然而共产党延迟很久后才进行这一转变[暴动]并且非常不坚定。直到 1923 年 9-10 月，不仅右翼而且左翼……都对革命的过程报悲观的观点。”（《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第 70 页）

三人团无力在德共的领导层中干涉和指导一个当时的形势下的大胆的革命化觉悟。托洛茨基被刻意孤立。后果是灾难性的。正如托洛茨基的一个亲密合作者在 1936 年写的（特地-格兰特 (Ted Grant) 的《第三国际的兴起和衰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第 28 页）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至少开始集中力量，宣布紧急状态和准备采取攻势时，德国共产党去无所作为没有进行斗争——甚至取消起义。（投降屈辱的消息没有及时传达到汉堡，所以当地发生了一场孤立的起义，而在战斗几天后被镇压。）

德共领导层的失败让德国工人阶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让欧洲革命失去了一个能够改变世界历史轨迹的胜利的机会。相反德共在随后几个月中被宣称为非法党派。在大量的美国援助之下，德国经济稳定下来，资本主义从悬崖的边缘被拉了回来。

而在几个月之前，保加利亚共产党群众（跟随其领导层）武断地拒绝和农会组建联合政府对抗右翼武装政变。同样在波兰，被德国革命激发的工人抗争也被挫败。

这些恶化的局势对在俄罗斯发生的党内斗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德国被看作是欧洲革命的钥匙。而现在清楚的是不再能指望未来数月或者数年会有来自西欧的援助。

一个恶性循环形成了。在官僚日益增长的对苏维埃党（通过它，同样对共产国际）的控制成为了革命政策发展和国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而其产生的后果又加强了能让官僚盛行的当前的沮丧情绪和保守主义。

政治觉悟不够的工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革命的前景失去信心。对于工人中的落后阶层来说，官僚的怀疑和讥嘲开始显得“现实”。

“沮丧的情绪弥漫了俄罗斯，”瑟尔基写到，“而官僚平稳地统治了三年。”（《从列宁到史达林》第 42 页）

问题讨论：

1. 1918 到 1921 年间在德国，义大利的革命运动的失败没有预示俄国革命的过于早熟和注定失败吗？
2. 残酷的“战时共产主义”政权没有为史达林主义准备好道路吗？
3. 为什么国家没有如列宁预测的那样在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枯萎”？
4. 对喀琅施塔得海员叛乱的镇压没有显示布尔什维克是极权主义者吗？
5. 如果史达林这么坏，那为什么他成为了共产党的总书记？

第三章：“一国社会主义论”

11. “托洛斯基主义”的发明

党的官僚操弄投票把反对派代表赶出 1924 年 1 月召开的俄共（布）党十三大，而只有这里才会决定党内激辩的结果。

例如在莫斯科，反对派在多数支部得到了大多数支持。在地区选举中即使被史达林委任的书记残酷地清除左派反对派的支持者，左派反对派依然得到了 36% 的选票。然而，反对派在省一级的所得票数却离奇地被进一步减半。

整个苏联只有三个反对派代表能够参加会议！

在这之后就接到列宁去世的消息。工人和青年群众就进一步感到沮丧不已，相对官僚立即就发觉到自己处在更有利的地位。

现在三头马车开始着手去挫败左派反对派在党的活跃分子中的力量。理论上作为向列宁致敬，他们把党向工人开放——难道托洛茨基没有批评过说事实上只有百分之十五的成员是工人？

1924 年 2 月至 5 月之间，大约有 24 万工人被吸收入党。事实上，这种所谓的“响应列宁的号召”，是对列宁发展起来的党的建设方法的嘲弄。（译按：《被背叛的革命》第五章二节）

正如 1919 年党代表大会解释：

“共产党是只团结无产阶级和最穷的农民中最进步的在其队伍中的组织——即这些阶级中自觉地为共产主义纲领的实践而奋斗那部分。

“在所有工人组织中共产党给予自身的任务是赢得决定性的影响...”

大量新党员充斥这个列宁的党正正和这个任务相反——而此是另有目的。三头马车机关算尽这个“响应列宁的号召”会首先为他们提供投票的弹药来消灭反对派。没有经验的党员在面对陌生的问题时，往往会跟随所给予的指导。很少新党员会觉得能够挑战政治局。

和在俄罗斯的情况一样，在国际间的共产党内的左派反对派受到大力支持。例如，法国和波兰具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都抗议对于托洛茨基的攻击。

这三头马车对此无法容忍。季诺维也夫滥用自己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职位，无情地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下解散各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班子以排除托洛茨基的支持者！

然而即使这样，只要作为理论家和十月革命的共同领导者而具有极大权威的托洛茨基继续铁面无私地依据马克思主义批评他们的机会主义和大错，党的官僚老爷们仍会感到不安。这是季诺维也夫和史达林主义必须伪造历史并把托洛茨基贬得一文不值的根本原因。（译按：可见《史达林伪造历史》）

他们的策略是发明“托洛茨基主义”（1923 年 12 月季诺维也夫创造的这个词）。透过强调过去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每一个差异以暗示托洛茨基“总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

托洛茨基被斥责为是孟什维克（在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令人困惑地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数个月，他发现自己身在孟什维克阵营直至托洛茨基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政治分歧变得清晰），他也被斥责为极左分子！特别是以他的不断革命理论来论证他的理论是对“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偏离”。

实际上，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的根本分歧正是 1917 年及之后的他与列宁的政治联盟的基础。

托洛茨基这样说明孟什维克：“所有俄国孟什维克的出发点是：只有作为政权的天然追求者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才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担当起领导作用。按照这一图式，无产阶级政党充当的角色只能是民主阵线的左翼。”（《不断革命论》初版序言）

据此，革命应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民主主义”的阶段（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未来的某一时刻“社会主义”才能提上议事日程。

托洛茨基反对这种机械公式并发展出在一个如俄罗斯这样的落后国家进行的革命的特质的分析。这种分析被十月革命光辉地确认，并以“不断革命论”闻名于世。

“一旦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托洛茨基在 1906 年写道：“政权就会转到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那个阶级手中，换言之，转到无产阶级手中... 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同它在经济上的奴役地位是不相容的。不论无产阶级是在什么政治旗帜下取得政权，它都必须走上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总结与前瞻》第五章和第八章）

他补充说：“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它既会遭到世界反动势力有组织的反对，又会得到世界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支持... 除了把本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联系起来，俄国工人阶级没有别的出路。”（第九章）

列宁在 1917 年 4 月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到 1924 年，“不断革命论”已经多年没有成为论题，关于它的争论已成历史。但是对于党官僚，党对于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承担——由托洛茨基—马当先所拥护的一一正成为一个不可容忍的眼中钉、肉中刺。

随着德国革命的失败，显然苏联要面对一个长期的孤立。对于官僚们而言，世界革命越来越变得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他们漠视了西欧的工人阶级，并定意去解决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间生存下去的“具体”任务。

物质条件决定意识。在 19 世纪 90 年代，伯恩斯坦发展了改良主义的“理论”，为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从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纲领上撤退提供正当性。

同样地在 1924 年至 1925 年，史达林炮制了一个“理论”反映了苏联官僚的保守主义，来反对托洛茨基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并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术语来为自己与它的决裂提供正当性：该“理论”就是“一国社会主义论”。

12. “一国社会主义论”

史达林从列宁的浩繁著作中引用了三段论述，在 1924 年 12 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观念，即社会主义可以在没有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胜利的情况下在俄罗斯建成。

这种想法违背了列宁试图解释的一切，即使在史达林所引述的列宁著作中也是如此。列宁只不过说明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条件（一个得到农民支持的工人政权）已被十月革命缔造出来了。列宁在任何阶段都没有怀有经济落后的俄国具备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这幻想。

迟至 1924 年 2 月，史达林仍然宣扬与“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完全相反的东西：

“... 没有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努力，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要实现最后的胜利可能吗？不，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这样一个农民的国家俄罗斯不足以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组织方式，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努力是必要的。”（史达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然而在几个月后，史达林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线：

“如果我们事先知道我们不胜任建设这个任务（由俄罗斯单独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发动十月革命呢？如果我们已经准备了 8 年，为什么我们不准备第九年第十年或者第四十年呢？”（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一国社会主义》，第 2 卷，第 181 页）

是什么使史达林把他原来的思想推翻了呢？

基本上是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鼓励了非理论家的史达林敢于对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行挑战。当时反对派、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的要求被压制，而越来越嚣张的官僚正逐步迈向胜利。

国际性地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思想（“不断革命论”）对苏联的新主人而言完全是头怪物。史达林对理论的彻底歪曲在字义上不是理论：尝试解释现实。它只是埋葬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断革命理论的尝试。

为了毁灭证据，官僚层日盛一日地“改造”党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使其向工人显示他们的政策是一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延续。例如，到 1926 年 11 月，史达林认为可以宣布：

“党始终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意味着在该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以及凭藉一个单独国家的力量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观念作为出发点”！（由伍兹和格兰特引用）

归根结底，史达林的“理论”否定需要一个革命的国际组织。国际上共产党的首要任务由通过世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变成了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这意味着对苏联官僚的利益和政策无条件的支持。（1943年，史达林本人也明确证实了这一点，他大笔一挥解散了当时已经是官僚空壳的共产国际，向他的战时盟友：帝国主义领导人罗斯福和邱吉尔证明苏联领导层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全部思想。）

左派反对派对官僚粗疏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提出疑问，则被指责为“悲观论者”和“愤世嫉俗者”。

实际上是反对派一直解释工业化的需要以加强苏联工人统治的基础。（对于这一点，他们却反过来被谴责为“超工业化者”！）但他们还解释说，这本身也不足以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另一方面，放弃国际主义纲领意味着抹杀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建俄罗斯的前景——即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欧洲的一部分。官僚的替代就是更加公开地依靠富农作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布哈林在1925年4月，竟脱口而出：

“对于农民...我们必须说：使自己富起来，开发你的农田，不用担心会对你施加限制。”（引自爱德华·霍列特·卡尔《一国社会主义论》，第1卷，第280页）这个口号因为它太露骨而遭到攻击，而中央委员会不采用它，但这个总的思路成为党的政策。

在这年完结前，史达林甚至考虑把土地去国家化！

这时，这三头马车开始崩解。它已完成它的任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加入了平庸的史达林的阵营是出于对托洛茨基的敌意。现在他们开始远离几乎拥有所有的权力的残酷的史达林。

三头马车之间的政治差异现在开始浮现。

在1925年12月的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提出对史达林思想的疑问。但是，要建立决定性马克思主义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反驳，并揭露其内在在危险的任务则要交给托洛茨基了。

今天这个问题比起在20世纪20年代更为重要。当今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在国际间，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的群众运动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官僚哲学（或“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许多领导人的出发点。

托洛茨基对史达林的答覆仍然是回答这些想法最清晰的基础，并提供了以马克思主义前进的道路。

13.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代表国际主义

托洛茨基表明1924年之前布尔什维克党内从未有向国际主义的纲领（现在被标签为“不断革命论”）提出异议。但是，史达林粗陋的挑战使我们有必要再次从根本上来说明这个问题。

托洛茨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开始。他解释说文明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推进的——通过人们和阶级在社会中为了满足其物质需求而进行斗争，从而促进科学技术、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社会制度在生产组织的基础上存在。一个社会制度只有到其发展的极限，并且有一个重新组织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新的革命阶级准备好夺权才会退出历史。

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所创造的障碍。社会主义的历史的目的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限制，以发展社会到更高水准的富裕程度和自由。

正如托洛茨基解释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结合、推广和最大限度的发展已有的现代科技的最高元素...但是，社会主义不仅要继承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生产力，而且必须立即把这生产力推向更高的位置...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能想像的高度。”（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40-41页）

换句话说，如果社会主义不表现能提供比资本主义能够提供的更高的生活水准（或表现为倒退的话），那么为结束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和牺牲是没有正当性的——而且对劳动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

为什么社会主义改造能使甚至比资本主义的最高成就更高的飞跃进步成功呢？一方面，因为它使生产摆脱了市场力量的无政府状态、私有制的扭曲和民族国家的界限。另一方面，它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压迫性纪律下解放出了工人的集体智慧和创造性。

换言之，工人民主管理是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前提。

为什么这样的转变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的边界内实现？正因为资本主义是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发展起来的。“最先进生产力”不包含在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中，它们取决于由世界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国家的工人阶级的联合努力。当然，它们不可能在一个如 1917 年的俄罗斯一样不发达的国家存在。

社会主义转变——控制最先进的生产力——只能是一个国际的进程，取决于至少一批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判定了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死刑）。

只要工人统治仍然局限在一个国家，它将面对掌握着巨大的经济和军事资源的世界各国资本家的敌意。

史达林的看法粗疏，认为十月革命除了要在俄罗斯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外没有其他目标，以致完全忽略了重点。列宁对于这问题的许多论述其一就已经事先回答了史达林：

“单独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但它可以让俄国革命成为一个伟大的推进，它将会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将在一定意义上说启动社会主义革命。它可以创造条件让它的主要的最值得信赖的和可靠的盟友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可以更方便地加入决战中来。”（《列宁全集》第 23 卷）

14. “一国社会主义论”究竟是什么？

苏联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因为在其边界内不存在“最高的生产力”。即使是基本的生存必需品也只能通过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贸易获得。

眼前的挑战是要赶上资本主义，占领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因此为作为国际性制度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换言之，苏联的根本弱点在于其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经济和技术落后。落后是官僚的根源（见第 6 章）；官僚统治排除工人民主，形成社会主义转变的一个绝对障碍。

官僚坚持把革命的国际问题看作为本质上是军事问题，并押注在苏联能够打败帝国主义未来的侵略上。

正如托洛茨基指出，即使是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也是由于其技术优势。但是，他补充说：“与其说是军事的威胁还不如说是更便宜的商品对苏联构成直接的最大的威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第 37 页）

换句话说：苏联群众将捍卫自己已获得的成果，并与公开的反革命威胁斗争。但因官僚统治而士气低落和失望，他们不能指望去抵御显然能为他们提供优越的生活的资本主义敌人来保卫自己的落后。

事实上在 1941 年入侵苏联的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军队而是希特勒。希特勒的军队带给俄罗斯群众的是铁丝网、可怕的奴隶劳动和灭绝人性的集中营，而不是“廉价商品”。

遭受纳粹野蛮的种族镇压，英勇的俄国工人团结起来保卫苏联。

今天国际间的力量对比已大大地转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再也没有任何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

官僚把巨大资源挪用到了军事发展上，并把苏联转化为一个拥核的超级大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已经有效地被遏止。

但即使这个只可能在国有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此壮观的经济发展，也不能克服一个由特权精英统治的俄罗斯社会所造成的扭曲。

官僚镇压扼杀由下而来的主动性。同时利用收买和强迫的手段来驱促工人前进。官僚的安慰说正以“蜗牛的速度”（布哈林语）建设社会主义像是在嘲弄工人的心愿。

实质这全部意义就是要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进行发展国有经济的艰苦斗争——在他们的统治下。

早在 1845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预言为何社会主义不能在如下条件下建立起来：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 ... 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文版），第 86 页）

这一见解赤裸裸地被俄国工人国家官僚的堕落证实了。官僚只能建立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伴随着不平等出现的是日益蔓延的腐败和官僚机构一部分的员警镇压，在群众中出现“人人为己”的严酷斗争。

来自一个集体农庄（集体农场）的职工在 1930 年 4 月写的信，总结了新产生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官僚主子之间的新的关系：

“集体农庄的成员有两个月没发工资... 百分之五十的收入到了集体农庄的国库去了，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为税收和租金。留给工人的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集体农庄的主席每个月给自己几张面粉票，而同时免于所有的体力劳动...”

1930 年 3 月工厂的一个工人这样说：“他们压榨我们，情况如何呢！劳动生产率增长 25% 而工资增加只有 1.9%，3 年里工资没有变化，但生产率已经提高非常多。用五个人取代六个人工作，设备没有变化。奖金制度适用于这样一个情况... 每 6 个月应该支付，但在现实中没有人能希望得到一个子...”（塞尔引自《从列宁到史达林》，第 60 和 61 页）

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这种条件下。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而官僚反革命破坏这个条件，需要重新创造这个条件：工人民主管理。

问题讨论

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

不断革命论不是一个破坏性的政策吗？任务难道不该是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吗？

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内建立，那么十月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托洛茨基的分析是正确的，而史达林是错的，史达林怎么会击败托洛茨基呢？

国际主义是否真的只是不可实现的梦想？

第四章：官僚集团的反革命

15. 中国的悲剧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他们的支持者，1926 年加入到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阵营中，希望共同奋斗把党从史达林日益反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拉回来。

史达林和他的力量则加入到了极右翼亲富农的布哈林为首的阵营中以实现击败联合左派反对派的目的。

这场斗争为国际上一系列新的动荡而贯穿始终。

在英国，1926 年 5 月的总罢工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危机。规模极小的共产党获得领导几十万工人反对改良主义总工会的机会，并准备将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

但俄国史达林主义领导层机会主义地与英国总工会中的所谓“左派”相互勾结，而允许不发生针对他们的斗争。总工会中的右派一有机会就背叛了罢工，而史达林的“左派”盟友未做任何抵抗。

十天后，罢工仍在蔓延，但总工会理事会一致要求取消罢工，而向老板们投降。这使英国工人阶级陷入了历史性失败。

他说：“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瑟尔基写道，“看起来失去了许多年，现在一盏巨大的明灯在东方升起；... 中国群众正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列宁到史达林》，第 44 页）

中国工人阶级正日益独立于反动的蒋介石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国民党。中共正在成为一个群众性力量。上海和汉口在工人的手中。一场争夺权力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史达林的机会主义阻挡在胜利的道路上。史达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曾对蒋介石怀有危险的幻想，并宣布国民党是“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和城市民主派[即资本家阶级]组成的革命阵营，基于阶级利益的社会基础上...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事封建统治秩序的斗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1926 年 3 月）

实际上，这意味着，共产党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权威。这与旧的孟什维克思想，工人阶级应该与“民主”资本家共同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为民主奋斗有什么差别呢？

左派反对派尽一切努力与这政策做斗争。他们解释说，蒋介石正在捍卫资本家和地主，需要苏维埃（工人）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建立民主制度。

“我们知道，蒋介石正准备公开背叛工会和他的共产主义盟友”，瑟尔基写道，“我们不被允许说话。史达林在莫斯科在成千上万工人面前郑重保证蒋介石没有什么可害怕。”（《从列宁到史达林》，第 45 页）

蒋介石利用史达林给他的这个机会，1927 年 4 月的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共产国际（在与所谓比蒋介石激进的“（国民党）左派”勾兑后，而遭遇进一步的失败），从而转向极左过程，并试图在广州发动起义。而它在工农的鲜血中注定会失败。

这些事件注定了中共作为一个革命的工人组织结束。

中国革命运动巨大地冲击了国际。

“刺激横扫了整个[苏维埃]党”，托洛茨基写道。“反对势力得以抬头... 许多年轻的同志认为史达林的政策专利破产是必然带来的接近反对派的胜利...”

我不得不在许多头脑发热的年轻朋友们头上倒一桶冷水... 认为我们的预测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事实可能会吸引一千、五千、甚至万余新的支持者。



但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而言，重大事情是不是我们的预测，而是中国无产阶级遭到镇压的事实。在 1923 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在 1926 年英国总罢工失败后，中国出现的新灾难只会加剧群众对国际革命的失望。

正是同样的失望，成为史达林国家改良主义政策[即“一国社会主义”]的首席心理来源。“《我的生活》，第 552-553 页)

因此，官僚集团短视的机会主义造成的国际失败同时强化了官僚集团，为孤立和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失败并创造了条件。托洛茨基解释说：

“先进的工人无疑同情于反对派，但是这种同情是消极的。群众不相信情势可以因一次新的斗争而改变。同时官僚却宣布说：“为着世界革命，反对派想把我们拉入一个革命战争之中。震动已经够了啊！我们现在有权利休息一下。我们要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信赖我们吧，信赖你们的领袖吧！”这种休息的福音，……，并且无疑在疲乏了的工人之中得到应和，在农民群众之中得到更大的应和。”（《被背叛的革命》）

16. 联合左派反对派的失败

在题为联合反对派纲要（1927 年）的主要档中，托洛茨基制作了一份共产党政府十年的资产负债表，以马克思主义对比盲目的机会主义官僚政策。

该宣言呼吁复兴苏维埃，恢复工人民主，以及大胆的工业化纲领。在反对党的压力，官僚提出有限的五年计划。但它是基于富农的利益，而忽视了工业发展的需要。宣言解释了替代选择：

“我们必须在各阶级间重新进行税收负担的再分配——富农和新富阶层应该承担更多，而减轻工人和穷人的负担...”

“我们必须引导朝着产业化、电气化和合理化发展，以提高经济技术实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条件为基础。”

反对党批评史达林灾难性的外交政策，试图追求“瞬间”从左翼改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领导人那里赢得支持，而不是将共产国际建为群众性革命力量。它解释道，帝国主义进攻的危险只能通过全面动员国际工人阶级的群众支持才能击败。

官僚们对这些观点没有答案。他们的“答覆”是要发动对反对派的恶性恐吓运动。

在中央委员会，现在挤满了史达林钦点应声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其他试图发言时，就会遭到别人的诅咒和怒吼。在党内其他地方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待遇。维克多-瑟尔基描述了一场又一场会议的情景：

“在聚会上充斥那种狂热前，我有机会发言，或者是试着发言。在三个小时的大声训斥后，我们得到了五分钟时间发言。之后他们会安排、六个，有时是十个积极分子以表达对书记处的支持。人们消极地看着，带着一定的焦虑；他们往往在我们这边，但他们很恐慌。”（《从列宁到史达林》，第 49 页）

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在这无情的政治迫害面前，反对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大规模群众集会中英勇地喊出了他们的口号：“让我们火烧右派——反对富农、新富阶层和官僚”，“让我们继承列宁的意志”，“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支持列宁党的团结！”

官僚反应惊慌失措而愤怒。他们看到，在列宁格勒示威前一个月，由于失误员警护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前往一个月台，当时数千名工人聚集起来聆听他们的发言。现在，反对派示威被暴力粉碎了，甚至有人向托洛茨基的车开枪。

1927 年 12 月，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反对派被允许作为代表出席。托洛茨基的关键支持者被开除。然而，反对派继续为其思想而斗争。伦敦的《泰晤士时报》的标题是“托洛茨基与史达林”报导：

他说：“尽管格别乌 [秘密员警]的禁止和努力，反对派意见仍然继续广为传播非法传单，据真理报，每一份都被印上成千上万...”（1927 年 12 月 2 日）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官僚统治是从此转入地下。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 2500 名支持者一起丧失了勇气而向史达林投降。更多被开除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跟随他们。托洛茨基自己被驱逐，流放到西伯利亚，然后——因为他仍然是反对派的焦点——1929 年初，他被从苏联驱逐出境。

尽管这些可怕的打击，托洛茨基和他的数千名支持者仍然坚持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和十月革命的纲领。在他们的宣传，他们确定自己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以区别自命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的新贵官僚。

在流放中，托洛茨基继续他的理论工作——他揭露了史达林主义官僚的机会主义、伪装与背叛，并在迅速变化的情况下澄清马克思主义的替代选择——这也许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这些思想将成为新的革命一代的指导方针。

17. 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

从 1920 年代末起，苏联的官僚集团政策经历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曲折，在国际劳工运动中创造了巨大的混乱。

该政权的支持者称赞每一个矛盾的变化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措施以捍卫苏联的“社会主义”。一些反对者对该政权表现的所谓“列宁主义”的滑稽丑恶感到绝望，声称革命的成果遭到了破坏，而俄罗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再被视为一个工人国家。

托洛茨基，在 1930 年代初努力应对这些问题，而得出结论认为，苏维埃工人国家在现实中已经退化成为一种新政权：

“由于官僚集团变得更加独立，而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官僚中心主义也越来越转向波拿巴主义 [根据法国军事独裁者拿破仑-波拿巴命名]”。（《托洛茨基 1934 年至 1935 年著作》（英文版）第 180 页）

波拿巴主义，托洛茨基如此解释道，

“从历史角度来说，波拿巴主义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时期的资产阶级政府。…波拿巴主义常常意味着政治上在各阶级间反复无常；但是波拿巴主义在历史上的一切转世投胎都保留着同一个社会基础，那就是资产阶级所有制。……”

“苏联官僚集团的自立统治是建立在在国内和国际各阶级力量之间看风驶舵这个基础上，这一点是绝对正确的。既然官僚集团的看风驶舵以史达林个人的全民公决统治而达到顶点，那末说这是苏维埃波拿巴主义也未尝不可。”（《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

这个波拿巴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是因为事实上它不是基于“资产阶级产权”的基础上，而是十月革命创造的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利益。

该政权的历史从 1920 年代起一直是“国内和国际各阶级力量之间看风驶舵”的最佳图解。

到 1927 年，正如反对派警告的，富农已经拿着枪顶住当局的脑门。为了提高粮食价格，他们从市场上收回自己的粮食，囤积黄金和武器准备最后摊牌。

城市受到饥饿的威胁。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突然成真了。

官僚机构在一片恐慌中做出反应，试图以行政法令杜绝危险，失败后不得不依靠暴力。他们实行粮食强制征用。富农抵制，官僚开始全面进攻。

左派反对派久已解释土地集体化的需要，但强调这应该是自愿的，以保持农民的支持，并尽量减少干扰。史达林对农民的战争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是一个盲目的反射动作，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迟至 1929 年史达林仍认为“个体农户能在给国家提供食物方面，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伊萨克-多伊彻 (I Deutscher)，《史达林评传》(Stalin 英文) 第 320 页) 现在，突然间农民的土地根据法令被集体化。到 1930 年，55% 的农民土地已经变成了国营农场，到 1934 年这一比例达到了 88%。

俄罗斯农村毁于内战。因为农民在把牲畜交公前，宁可宰杀他们，大饥荒爆发。据估计，由于官僚暴行，导致一千万人直接丧生。整个农民社区乃至整个民族被杀害或驱逐出境。在城市中，面包重新开始配给供应。

这些事件粉碎了新经济政策，结束了史达林和布哈林与党内右派的联盟，并成为他在 1927 年和 1934 年之间堕入暴力极左主义的真正基础。

反对派长久以来一直主张工业化，但由于受到右派的压力而遭到当局轻蔑地拒绝。现在，史达林发现除了工业化别无选择——于是在恐慌下自上而下地采取了无情的强制措施。1928 年，根据反对派的提议，官僚们半心半意地退出了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但现在，突然命令要在四年内完成该计划！

大量的项目被推出——水坝、电站、钢铁厂、矿山——这在十年间改变了苏联。当资本主义世界在 1930 年代陷入萧条之中时，苏联的工业生产跃居领先了 250 个百分点。令人惊讶的是，到 1935 年落后的俄罗斯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生产更多的拖拉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协调一致的发展将是不可能的。俄罗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像今天的第三世界会继续挣扎在绝望的贫困中。

“社会主义”，托洛茨基说：“已经证明其胜利的权利，不是在《资本论》的书本上，而是钢铁、水泥和电力的语言...”（《被背叛的革命》，第 8 页）

苏联在 1930 年代的进步给世界各地的劳动人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在官僚统治下，也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官僚的办公室发出各种命令，经常是疯狂不现实的。未能执行这些命令被视为破坏。大规模使用强迫劳动。高达 1500 万苏联公民被赶进奴隶劳动营，其中包括反对集体化的农民谁，以及后来形形色色的反对派。难以计数者被牺牲。

1928 年到 1932 年，工人阶级的数量从 1100 万激增到 2300 万，1931 年引入所谓“劳工本”的通行证将工人锁定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当官僚集团培养出工人贵族的同时，工人工资的价值从 1928 年至 1935 年下降了三分之二。

牛奶人均消费量从 1927 至 1928 年的 189 公斤下降至 1932 年的每年 105 公斤，肉类消费从 27.5 公斤下降至 13.5 公斤——而同时官僚集团则牢牢确立了他们的特权生活方式。

尽管工人付出超人的牺牲，苏联几乎在每一个方面仍然落后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文化落后不是官僚支配所能克服的。先进的新产业需要高标准的劳动力，而这是不能像建铁路线一样实现的。

为在这一基础上实现工业化，需要将数百万工人压迫到极限，粉碎一切反对力量，必须要最无情的权力集中。官僚制度沦为不折不扣员警专政。

史达林同时粉碎后左派和右派，而作为官僚“共产党”党的最高仲裁者。史达林曾经是官僚集团执行的刽子手，而现在成了它的主人——处于最高位的官僚，给他的门客们分配特权和地位。

托洛茨基总结：

“史达林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不仅反对封建资产阶级反革命，而且针对的劳动者的诉求、他们的不耐烦和不满，他粉碎代表历史性和进步的没有特权的劳动群众的左翼，他通过工资、特权、地位等极端分化的手段创造了一个新贵族阶层。”

依靠新的社会秩序中最上层阶层来反对最下层，——有时反之亦然——史达林已经将其手中的权力完全集中起来。如果不是苏联的波拿巴主义，这一制度还应该叫什么呢？“《托洛茨基 1934 年至 1935 年作品集》（英文）第 181 页）

18. 从“第三时期”……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服务于相同的利益。官僚与富农和党内右翼暴力的决裂伴随着在国际舞台上猛烈地转向极左主义。

与机会主义路线导致英国和中国灾难相反，史达林于 1928 年 8 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完全相反的路线以挽救当局的“革命”信誉（这是四年来第一次）。

史达林宣布，从 1918 年以来资本主义已经过两个“时期”，第一阶段是直到 1923 年的革命时期；然后，是一个“逐步和部分稳定”的阶段。现在，“第三阶段”的严重危机开始，这将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崩溃”，为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马克思主义解释说，资本主义没有“最后危机”这样的事情。资产阶级总是通过牺牲工人阶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直到他们的统治被推翻。

然而史达林的目标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是促使共产国际向左发展。各国共产党为了获得运动的领导权，必须要粉碎所有其他政治倾向，辩论的时刻已经结束了！

作为在劳工运动处方内战，史达林提出了疯狂的论点，即“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他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以撒-多伊彻，《史达林评传》（英文），第 401 页）

“史达林主义第三阶段”最灾难性的结果发生在德国，在那里工人阶级分裂，使希特勒得以夺取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变得不可避免。

由于史达林未曾预料的原因，1929 年 10 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崩溃导致了世界性资本主义衰退。尤其是德国一片荒芜。但是由于领导层和宗派主义的危机瘫痪了劳工运动，这使得希特勒的纳粹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破产的中产阶级、失业者、工人和青年都在眼巴巴地指望着白白德国社民党与德国共产党能拿出解决方案。而社民党领导人却与资本主义结合，而德国共产党则攻击社民党，并破坏它的会议。

中产阶级和最受蹂躏的阶层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了“民族社会主义”的阵营中。法西斯煽动性攻击资本家和犹太人，他们神秘的承诺恢复德国的“伟大”。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确的决心对这些苦难中的阶层而言，看起来是唯一的选择。

在有组织的工人中，对希特勒的支持是几乎不存在的。

托洛茨基解释迫切需要工人组织组成统一战线粉碎法西斯威胁，并且这样做，工人阶级就要准备夺取政权。但是，共产国际史达林的领导面对的现实却是又瞎又聋。

德国劳工运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都有军事力量。但是，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拒绝与所谓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合作——而在 1931 年甚至走得更远曾和纳粹联合试图推翻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

德国工人运动是世界各地工人的希望，其领导层没有任何认真抵抗的尝试就被消灭了。

史达林主义者无力得出正确的结论。1933 年 4 月，希特勒获得权力，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领导层的历史性失败和共产国际内部缺乏任何批评，最终说服了托洛茨基，共产国际就和此前的第二国际一样，作为工人革命的工具已经死亡。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已被这十年的野蛮冲击一扫而光。对于新的世界大战和新的革命一起的预期出现了。客观地说，需要一个新的国际为未来关键的斗争重新组织、建立并准备马克思主义的力量。

19. ……“人民阵线”

欧洲的阶级力量改变使苏联政权迅速发生一次新的大转弯。

相比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威胁。最重要的是，史达林害怕战争和其会对苏联群众造成的影响。为了避免战争，他考量有必要安抚希特勒。

在整个 1933 年，当希特勒清算了德国共产党、社民党和工会，并开始对犹太人大屠杀，史达林没有做出一声批评。在整个 1930 年代，苏联官僚希望与希特勒达成的协议。

但是，希特勒在他的“盟军”帝国主义对手面前，是用“共产主义威胁”作为藉口重新武装。他不能在这个阶段被视为与史达林友好往来。（仅在 1939 年 8 月，当希特勒准备发动袭击西方时，希特勒才与史达林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略条约。）

处于法西斯主义和右翼政权的包围中，史达林的“革命”极左主义消失。托洛茨基和国际左派反对派解释（正如十二年前共产国际的解释）表示，苏联的唯一真正安全保障是革命的国际主义——支持工人在资本主义国家夺取政权的斗争，向敌人发动战争而瘫痪反动力量。

但俄罗斯官僚却根本不可能去遵循这一路线；因为如果俄罗斯工人被这些想法影响的化，那么官僚集团的专制体制将成为第一个受害者！相反，他们悄悄地忘记了资本主义还处在其“第三阶段”，于是他们向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寻求支持反对希特勒！

而帝国主义也没有不愿意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史达林。1934年9月，他们接受苏联加入国际联盟的申请（列宁将之描述为“强盗的巢穴”）；1935年5月法国帝国主义与史达林签订了“互助”协定！

这是苏联官僚退化的一个标志性的新阶段。他们第一次公开而蓄意地与资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从这点起，作为与资产阶级结成“友谊”的条件，他们机会主义的失败变成了在国际范围内蓄意背叛工人革命。

早在1928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时，不祥之兆早已体现，当时“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毫无杂音就被接受。当时托洛茨基就曾警告。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路线解体的开端”。（《列宁之后的第三次国际》（英文），第55页）1934年后这个预言很快成为事实。

苏联官僚与“进步”资本主义列强纠缠之际不可避免地，国际上的诸共产党寻求在自己的国家与“进步”资产阶级和改革派达成联盟。

现在的口号变成了“人民阵线”。工人的阶级的要求从共产党的纲领中被取消——因为这将“疏远”的“进步”的资产阶级！

史达林主义者明智地宣布，要赢得中产阶级的“广泛支持”，只能通过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诉求的纲领。今天虽然中产阶层在工业化国家已不再是群众性力量，但是“共产党”仍然使用相同的纲领和相同的论点。这证实，那么和现在一样，其真正的目的不是要赢得群众的支持，而是争得一个与资本主义政党讨价还价的地位。

这一立场在1935年和1936年期间在法国和西班牙爆发的革命事件中完全破产。首先在法国，然后在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在共产党的支持下赢得权力。在这两个国家中，经济大萧条和右翼的严酷统治为群众斗争开启了闸门。

在西班牙，1936年7月发生的军事政变试图推翻“人民阵线”政府。改良主义者、史达林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颤栗栗栗，而工人和农民拿起了武器。几天之内，整个国家大部分处在他们的控制下。西班牙陷入了比俄罗斯1917年还严重的全面革命危机之中。

伦敦《泰晤士报》8月1日的标题是“巴塞隆纳处在红色统治下——极端分子失去了控制”。两天以后，它的记者总结了群众的要求：

“36小时工作周、失业津贴、控制生产、没收和分配土地，……维持[工人]民兵武装……”

又经过几天：

“工人委员会已经接管大铁路公司。何时接管有轨电车、银行和其他重要机构，看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泰晤士报》，1936年8月8日）

史达林并不比资产阶级更少恐惧正在发生的革命。他希望与英法帝国主义者稳定的关系处于危险之中。更糟的是，西班牙工人的榜样会威胁与感染俄国工人同样斗争以控制社会。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勒死西班牙革命。

西班牙共产党亦步亦趋地追随莫斯科的指示，发动了反对工人革命运动的全面斗争。

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名义下，他们主张“两阶段论”的孟什维克理论，将他们的纲领局限为“资产阶级民主”，徒劳地希望以此安抚资本家，“共产主义”不会对他们构成任何威胁。格别乌的行刑队被派往西班牙以协助解除工人武装和消灭他们先锋队的可怕任务。

由于史达林独断专行并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媾和导致的推迟，所谓的“共产党人”无视俄国革命的第一课：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民主和稳定。在西班牙这样的半发达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只能在工人阶级本身的控制下才能执行。

可悲的是，西班牙托洛茨基的同情者错过了用他们的纲领赢得社会主义青年，建立马克思主义群众基础和领导的运动胜利的黄金机会。

没有马克思主义领导层，工人阶级无法面对阶级敌人和自己的改良主义者和“共产党”领导层的联合攻击。史达林主义成功地分化了运动，孤立了左派，并谋杀的最好的战士。这使得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无法避免。

欧洲工人阶级胜利的最后希望已被扑灭，至少由此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

20. 血流成河

苏联内部官僚集团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导致对残余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的清算。

国际上诸共产党将苏联粉饰社会主义的快乐祖国。史达林的继任者赫鲁雪夫在 1956 年召开的 20 届党代表大会上却揭露了面纱背后真实一角：

“史达林不是通过说服，耐心解释，并与人合作来处理事情，他强行实施自己的概念，并要求绝对服从他的意见……他放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而用行政暴力、大规模镇压和恐怖取代。”（《莫斯科审判》（The Moscow Trials），第 17-18 页）

官僚暴政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当镇压加剧，统治者对报复的恐惧相应增加。对手，由权力驱使，是不能够信任的。即使他们放弃信仰，以后会不会再次成为威胁呢？甚至为由下而上发生的叛乱提供火种？

整个党受到史达林和官僚集团的强烈怀疑——尤其是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他们还记得当年列宁的党，并只因为恐惧而对官僚主义的罪行一直保持沉默。

布哈林早在 1928 年已经开始害怕他曾帮助创建的怪物。在一个与加米涅夫的秘密讨论中，他畏惧地表示：“我们可以做什么？面对着卑鄙的成吉思汗般程度的对手……？”（瑟尔基《从列宁到史达林》（英文），第 91 页）

虽然老布尔什维克们低下头，年轻一代却冒尖起来，渴望恢复十月的理想。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激化。全党充满沸腾不满，而在 1930 年代初开除党籍的人数达至几十万。

然而，尽管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投降了，他们仍然比史达林和当政的官僚集团更受尊重——因为官僚集团中许多是声名狼藉的前孟什维克和当年十月革命的敌人，只在到战争结束才站到了胜利的一方。

这些矛盾到 1936 年西班牙革命时期发展到高峰，在国际上工人运动所爆发的冲击波，鼓舞了俄罗斯的人民群众重新推动工人民主行动。

官僚机构立刻要将危险扼杀于萌芽状态。最可怕的讽刺是，在国际上承诺保证资产阶级民主的同时，他们在苏联本身掀起了一股最黑暗的恶梦统治。

此刻发生了“莫斯科审判”：被挫败的老布尔什维克被指控谋杀、破坏、恐怖主义等——任何你可以想像到而难以置信的诬蔑以诋毁他们并恐吓其他人。

但针对他们的主要指控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一个接一个被指控“与托洛茨基共谋”，自 1921 年以来他就被污蔑成“资本主义的间谍”和“德国特工”！

就这样该政权背弃了实施“清洗”的真正动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工人民主、工人报复的极度恐慌，他们对国际工人运动中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昂-托洛茨基——充满仇恨。

正如当年在俄罗斯的《泰晤士报》记者坦言：

“问题的根源是史达林从来没有完全赢得他自己政策的与托洛茨基国际主义政策之间的斗争。他永远也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共产主义仍然是国际性的……最近狂热的共产党人 [革命家] 的不满在增加……更多的人关心巨大的工资不平等……它决定要永久使反对的声音消声，并彻底消灭国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残余。”（1936 年 8 月 21 日）

在史达林的“法官”前走过一排曾经是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行尸走肉，他们被恐吓和勒索迫使承认任何和每件要求他们承认的事情。

三场“审判”演出分别是：1936 年 8 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937 年 1 月（拉狄克，皮达可夫和其他人）和 1938 年 2 月（布哈林，李可夫，雷科夫斯基等）。起诉人是前孟什维克律师维辛斯基，他在内战期间曾与白军合作。现在，他终于对革命的前领导人释放官僚们的报复仇恨：

“疯狂的法西斯警犬”！“卑鄙的人类渣滓！阴间败类”！“打死这帮蛇鼠”

除了格别乌获得的“供词”，他们就没有任何指控证据。但是，除了一、两个例外，全部都被判处枪毙。

这全部的谋杀，每一个由维辛斯基所带来的诅咒，世界上各国的“共产党”却都在为它辩护。

托洛茨基解释了整个荒唐的逻辑：

“为了使镇压合理化，需要制造出指控。为了让这些不实指控变得有力，就必要以更残酷的镇压来强迫。因此这场斗争的逻辑令史达林走上司法不伦不类的不归路。”（《莫斯科审判》，第 129 页）

莫斯科审判，只不过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官僚反布尔什维克党的单方面内战”，冰山一角。随后一浪接一浪的逮捕潮。无数拒绝在公众场合“认罪”的老布尔什维克，则在监狱中被暗杀。在西伯利亚劳改营中的左派反对派成员被成批地揪出来枪毙。数以万计——俄罗斯工人运动之花被消灭殆尽。

左翼反对派至死仍然是革命者。1936 年年底在西伯利亚沃尔库塔劳动集中营里，托洛茨基主义者以不屈的勇气带领其他囚犯向暴政作出最后的反抗，他们靠的就是仍然有的唯一武器——绝食。（《战斗派国际评论》（Militant International Review），33 号，第 43 页）

四个月后的所有要求被接纳。但处决亦很快开始执行。当一名男性政治囚犯被枪毙，他的妻子和任何十二岁以上的子女通常也会被杀死。

出席 1935 年第 17 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 1,966 名代表中，至 1938 年已有 1108 人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当时 139 名中央委员中 98 人被枪毙。

在 1939 年的 1558852 名共产党员中，只有 1.3% 是十月革命以来的老党员。列宁 1917 年的中央委员会中，只有史达林作为领导者活了下来，而他身边被前孟什维克和走狗们包围。布尔什维克党的最后残余已经被根除。

其中一名在 30 年代幸存下来的 1917 年的领导拉斯柯尔尼科夫，他当时是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1938 年被征召回莫斯科“晋升”（即被枪毙），他随即选择逃亡，亦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史达林：

“依靠肮脏伪造的帮助下，你进行着比中世纪的女巫审判更可笑虚假的审判和指控... 花言巧语的作家美化你为与太阳和月亮并排的半神人，就像东方专制君主，享受香油拜祭。你无情地消灭令你不高兴的作家们……早晚，苏联人民将会把你作为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叛徒而进行审判。”（直到 1987 年 6 月该信才在苏联《火花》（Ogonyok）上杂志首次发表）

在 1930 年代，史达林政权下的死亡总人数估计在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万人。如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幸存者，我们可以理解到他们对史达林的满腔怒火。但也绝不能忘记这场屠杀不单单是贪恋权力、残忍或（赫鲁雪夫错误地解释为）“个人崇拜”的后果。这是由反革命的官僚们对抗革命性的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反扑的高峰。

史达林所建立的政权跟列宁和托洛茨基建立的政权毫无共同之处，虽然表面上（所为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苏维埃”等名称）会让人有误解。血河将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官僚制度彻底分开。

以史达林主义的历史性体现于是这首幸灾乐祸的诗，刊载于在莫斯科第一次审判后的一份白色杂志：“我们感谢你，史达林！

十六个恶棍，
十六祖国的屠夫
已将他们送去见自己的祖先……

“但是，为什么只有十六个？
给我们四十，
给我们几百，
数以千计；
在莫斯科河上架座桥，
一个没有梁或塔的桥，
由苏联腐肉建成的桥——
并将您的躯体加上去！

21. 结论

在苏联的史达林主义和西欧法西斯主义的恐怖蔓延下，马克思主义力量在 1930 年代覆灭了。只有托洛茨基（在 1940 年被史达林特工暗杀）的天才和坚定，与一群很少的追随者仍然进行对下一代争取社会主义的工人斗争作思想再教育。

托洛茨基到他生命的最后依然继续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就是国有计划经济——尽管“苏维埃”的政权官僚畸形化，他拒绝接受俄罗斯已成为“国家资本主义”。

但与此同时，他解释说这政权没有“改革”重建工人民主的可能。它必须由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推翻及瓦解，并再次将政权重夺回到工人的手中，重新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托洛茨基最突出的作品是《被背叛的革命》，里面提供了这本小册子所提出论述的详细和科学的解释。

今天苏联的力量平衡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今天苏联工人阶级是最强大和拥有最好教育的。官僚在今天已经没有用处，它已成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一个绝对障碍。戈巴契夫试图精简官僚机构（正如在他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和赫鲁雪夫一样）不能改变其统治官僚的历史破产。

相反，它反映了苏联的史达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爆发政治革命的客观条件愈趋成熟，以推翻官僚主义并恢复工人阶级的角色。（泰德-格兰特（Ted Grant）的《戈巴契夫：改革还是革命》（Gorbachev: Reform or Revolution）充分说明这点[编者注：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对苏联前景的立场，以及多数派的意见均在这个网站史达林主义崩溃崩毁的章节中刊登]）

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在 1956 年和波兰在 1980-81 年的等已经出现那些辉煌的政治革命“彩排”。

在国际上，80 年代的状况正好是 30 年代后期的相反：革命运动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觉醒。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再一次吸引着从利物浦到斯里兰卡，从南非到西班牙的工人和青年们的目光。

我们必须重新学习俄国革命的胜利和退化的教训，以迎接在今后一个时期将会面临的任务：各大洲工人阶级夺取权力，建立工人民主，进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改造。

问题讨论

共产党在中国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的错误是什么？

左翼反对派应该在 1928 年被共产党开除后呼吁独自成立一个新政党吗？

史达林的确犯下错误，但他不是提出了五年计划以纠正错误吗？

对抗上台后的希特勒法西斯的反动势力，团结所有民主力量的人民阵线不是必然策略吗？

大清洗证明了革命的成果已经完全消失了吗？

俄罗斯今天新的革命任务什么？

重要的参考图书书目

这不是阅读书目，而是作者写作所使用的书目（已标注页数）。相关书名也可找到较新的版本，有时使用不同出版商的同一书籍标有*，虽然其中一些书已经绝版，但应该可以在一家比较好的公共图书馆借阅到。

第一部分

《1917 年至 1923 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23），E.H. 卡尔 (E. H. Carr) 1966 *Pelican Books

《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The Bolsheviks Power）A.F. 伊林-赞诺夫斯基 (A.F. Ilyin- Zhenevsky) New Park

《震惊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约翰·里德 (J. Reed) 1977 年 Penguin *

《从列宁到史达林》（From Lenin to Stalin），V. 瑟尔基 (V. Serge) 1937 年 Pioneer*

《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L. 托洛茨基 (L. Trotsky) 1967 年 Sphere*

《我的生活》（My Life）L. 托洛茨基 (L. Trotsky) 1975 年 Penguin*

第二部分

《1923-1924 年的空白期》（The Interregnum 1923-1924）E. H. Carr (E.H. Carr), Pelican*

《共产国际 1919 至 1943 年文档》（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 Documents）德格雷 (J. Degras) 1956 年伦敦

《共产国际的兴起与衰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E. 格兰特 (E. Grant), 1985 年 战斗派

《国家与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列宁。1976 年 北京

《官僚主义还是工人政权》（Bureaucratism or Workers' Power）R. 斯维曼 (R. Silverman) 和 E 格兰特 (E. Grant) 1982 年 战斗派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Terrorism and Communism）L. 托洛茨基 (L. Trotsky) 1975 年 New Park

《新路向》（The New Course）L. 托洛茨基。1956 年 New Park*

《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L. 托洛茨基。1967 年 New Park*

《列宁后的第三国际》（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L. 托洛茨基 1974 年 New Park

《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真正的主张是什么？》（Lenin and Trotsky: What they really stood for）A. 伍兹 (A Woods) 与 E 格兰特 (E. Grant) 1972 年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lumbo*

《1923 年反对派文档》（Documents of the 1923 Opposition）1975 年 New Park

第三部分

《一国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One Country），E.H. 卡尔 (E. H. Carr) 1970 Pelican Books*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1969 年 Moscow

《不断革命论》和《总结与前瞻》，托洛茨基。1962 年 New Park*

第四部分

《史达林评传》（Stalin）I. 多伊彻 (I. Deutscher) 1966 年 Penguin

《联合反对派纲要》（The Platform of the Joint Opposition 1927），托洛茨基。1973 年 New Park

《莫斯科审判：选集》（The Moscow Trials : An Anthology）1967 年 New Park

延伸阅读

英国《战斗派》（Militant）报纸的相关文章：

683 期（Militant 683）列宁最后的斗争（Lenin's Last Struggle） 834 期 1917 年回顾（overview of 1917）；

835 期 1917 年 2 月（February 1917）； 842 期 1917 年 4 月（April 1917）；

859 期科尔尼洛夫反叛（Kornilov's revolt）；

869 期十月革命（The October Revolution）； 1987 年 11 月史达林主义的崛起（rise of Stalinism）

《战斗派——国际展望 18 期》（Milita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8），被遗忘的革命——1919 匈牙利俄国革命研究导论（Russian Revolution study guide），尤其是关于俄国 1917 年二月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文章。

《十月革命的理想》（Ideals of October）英国工党社会主义青年组织（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LPYS）发行的

《保卫十月》（In Defense of October），L. 托洛茨基

《官僚主义还是工人政权》（Bureaucratism or Workers Power?），瑟维曼与（泰德）格兰特（Silverman and Grant）

《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真正代表什么？》（Lenin and Trotsky: What They Really Stood For），（艾伦）伍兹（Woods）与（泰德）格兰特（Grant）

《十月的教训》（Lessons of October），L. 托洛茨基

《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L. 托洛茨基

《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约翰·里德（John Reed）——对 1917 年大事件的生动见证

《掌权的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 in Power），伊林-申维斯基（Ilyin Shenevsky）

《从列宁到史达林》（From Lenin to Stalin），瑟尔基（Serge）

《共产国际的兴起和衰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列宁的最后书信》（Last letters and articles by Lenin）

《来自左翼反对派的挑战》（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L. 托洛茨基

（包含托洛茨基的《对官僚主义的挑战》（challenge to bureaucratism）、《新路向》（The New Course）、

《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Towards Socialism or Capitalism）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Terrorism and Communism）L. 托洛茨基

《社会民主与战争干预》（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Wars of Intervention）L. 托洛茨基

《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托洛茨基与列宁

《被背叛的革命》（Revolution betrayed）L. 托洛茨基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附录

《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史达林主义》（Stalinism or Bolshevism）

《1931 至 1937 年西班牙革命》（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1937）

《史达林伪造历史》（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



www.socialism.hk
socialist.hk@gmail.com

香港九龍深水埗
價格: HK\$ 30.00